

齐鲁历史文化丛书

# 王懿荣与甲骨文

俞祖华

著

山东文艺出版社

责任编辑——牟瑞平 封面设计——张振钢 版式设计——黄晓春

齐鲁历史文丛  
卷一

ISBN 7-5329-2364-9



9 787532 923649 >

ISBN 7-5329-2364-9

1-1895 定价 10.00 元

# 历史书 齐鲁文化丛书

王懿荣  
与甲骨文

金聲玉振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王懿荣与甲骨文/俞祖华著. —济南: 山东文艺出版社, 2004. 10

(齐鲁历史文化丛书. 第8辑/王志民主编)

ISBN 7-5329-2364-9

I. 王… II. 俞… III. ①王懿荣—生平事迹②甲骨文—基本知识 IV. ①K825.81②K87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99435 号

主管部门	山东出版集团
集团网址	www.sdpress.com.cn
出版发行	山东文艺出版社
电子邮箱	sdwy@sdpress.com.cn
地 址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印 刷	山东新华印刷厂德州厂
版 次	2004 年 10 月第 1 版 2004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4 插页/2 千字/67
定 价	10.00 元

# 齐鲁历史文化丛书

## 编委会



顾问 苗枫林 安作璋 袁世硕  
董治安 刘蔚华 戚其章  
徐北文 骆承烈

主任 王修智

常务副主任 朱正昌

副主任 王志民 王凤胜 齐涛  
王兆成 刘德龙

委员 朱长富 李长顺 宫志峰  
宋焕新 范跃进 钟永诚  
聂宏刚 王学典 刘大可  
路英勇

主编 王志民  
副主编 仝晰纲

## 文化、先进文化与齐鲁文化

王修智

文化是一种内涵丰富的社会历史现象,它有广义、中义、狭义之分。广义的文化,指的是人类在社会历史实践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中义的文化,与经济和政治相对应,主要指人们改造主观世界的能力和成果,也就是精神文明;狭义的文化,专指文学艺术、新闻出版、哲学社会科学等。我们讲的文化,通常是指中义的文化。

文化的力量是巨大的。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它与经济和政治相互交融,既是一定社会经济和政治的反映,又对二者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文化是旗帜,引领着人们为了理想信念而奋斗。文化是纽带,把人们紧紧凝聚在一起,同甘共苦,风雨同舟。文化是灵魂,渗透在经济政治生活的各个领域各个方面。文化,能够穿越时空而代代相承,历经沧桑而风采依然。人可以受文化的陶冶而高尚勇敢,民族可以因文化的熏



染而生机勃勃。纵观人类文明发展史,许多民族的兴衰成败都与文化的传承变迁密切相关——哪一个民族重视继承和发展自己的文化传统,凝聚力生命力创造力就强盛,就能够百折不挠,发展进步;反之,哪一个民族丢掉了文化根基,就会人心涣散、方向迷失,最终走向衰落、分裂或者被外族同化。

中华民族有着悠久灿烂的历史文化传统。上下五千年,绵绵不断的文化传统一以贯之,成为团结激励一代代中华儿女自强不息的强大精神动力。当今,我国已经迈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时期。党的十六大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必须在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的同时,大力发展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这是历史赋予我们的神圣使命。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就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提出的“先进文化”。这是一种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它应由三种文化有机结合而成:一是中华民族五千年形成的优秀传统文化;二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大众的革命文化;三是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条件下崛起的包括吸收外国先进文化成果在内的现代文化。

山东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在这块土地上诞生和众展起来的齐鲁文化,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瑰宝。齐鲁文化,是对春秋战国时期齐文化、鲁文化的总称。它们孕育于西周初年齐、鲁建国之始,生成

于春秋,繁荣发展于战国,至汉代被吸收兼容。春秋战国是中国历史上思想活跃、百家争鸣、人才辈出的伟大时代,此间齐鲁大地涌现出一大批贤哲圣人,如孔子、孟子、曾子、子思、墨子、管仲、晏婴、孙子等等。他们为了寻求天下大治、强国富民之道,开宗立派,标新立异,纷纷构建自己的思想理论体系。这些思想理论相互渗透与扩展,透渐形成了齐鲁文化的主体内容和鲜明特色,这就是以“人”为本,以“仁”为核心,以“和”为贵,以“礼”为形式,以“天人合一”为目标,以“因时变革”为灵魂。浩浩荡荡的齐鲁文化思潮,深刻影响了诸侯国统治下的整个社会,猛烈冲击了传统的宗法等级专制统治秩序和思想意识形态,并成为此后两千多年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从这个意义上讲,齐鲁文化虽然不能等同于中国传统文化,但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源头和思想精华则出自齐鲁文化。

齐鲁文化的故乡,理应成为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排头兵”。为此,山东省委、省政府提出了建设“大而强、富而美”社会主义新山东的奋斗目标,确定在建设经济强省的同时,建设文化强省,全面启动文化建设工程。组织编撰《齐鲁历史文化丛书》,用通俗易懂的形式介绍齐鲁文化,使干部群众进一步加深对民族精神、民族文化、民族传统的认识和理解,就是其中的一项重大举措。这套丛书自去年初开始组织编写,历时一年有半,在各方面的关心支持





下,经全体编撰人员呕心沥血,反复酝酿,认真研讨,几易其稿,终于出版面世了。

《齐鲁历史文化丛书》共 100 册,是一部气势恢宏、特点鲜明的鸿篇巨制。一是内容丰富。囊括了齐鲁历史文化长河中的所有重要人物、重要事件、重要典籍以及具有典型意义的遗迹、遗物等等。二是脉络清楚。从齐鲁文化的源头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开始,到其发展繁荣的鼎盛时期春秋战国,再到秦汉之后两千年的繁衍传承,线索清晰,史料翔实,比较全面和系统。三是观点权威。荟萃了省内外一流的专家学者,采纳了考古发现和学术研究的最新成果,代表了目前我国齐鲁文化研究的最高水平。四是可读性强。以广大干部群众为读者对象,最大限度地把学术成果通俗化,是学术走向民间的新尝试。这套丛书的出版,对于我们进一步学习了解齐鲁文化,继承和弘扬齐鲁文化的思想精华,以史鉴今,咨政育人,面向未来,开拓创新,都将大有裨益。

齐鲁文化博大精深,学术研究永无止境。让我们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认真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不断开辟齐鲁文化研究的新领域新境界,为发展繁荣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做出应有的贡献。

2004 年 8 月

## 《齐鲁历史文化丛书》总目

### 第一辑

- |          |      |                     |
|----------|------|---------------------|
| 齐鲁文化概说   | 王志民  | 山东师范大学齐鲁文化研究中心教授、博导 |
| 考古学反映的山东 |      |                     |
| 古史演进     | 张学海  |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
| 齐鲁文明初曙   | 邵文臣  | 山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     |
| 东夷古史传说   | 张富祥  | 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院教授        |
| 大汶口文化    | 栾丰实  | 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导     |
| 山东龙山文化   | 王守功  |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
| 岳石文化     | 方  辉 | 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导     |
| 商代的山东    | 徐  基 | 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
| 中华名山之首泰山 | 魏  建 | 山东师范大学齐鲁文化研究中心教授、博导 |
| 齐长城      | 张华松  | 《济南教育学院学报》编辑部副教授    |

### 第二辑

- |           |     |                  |
|-----------|-----|------------------|
| 姜太公       | 韩玉德 | 青岛大学师范学院历史系教授    |
| 周公        | 杨朝明 | 曲阜师范大学孔子文化学院教授   |
| 齐桓公称霸     | 战化军 | 山东理工大学齐文化研究院教授   |
| 管仲与《管子》   | 刘蔚华 | 山东社会科学联合会研究员     |
| 晏婴与《晏子春秋》 | 王其俊 | 山东社会科学院儒学所研究员    |
| 左丘明与《左传》  | 张汉东 | 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
| 孔子        | 王钧林 | 孔子基金会《孔子研究》编辑部教授 |

- |            |     |                 |
|------------|-----|-----------------|
| 孔子与六经      | 丁 鼎 | 《烟台师范学院学报》编辑部教授 |
| 《诗经》中的山东诗歌 | 徐北文 | 济南教育学院中文系教授     |
| 孙武与《孙子兵法》  | 李兴斌 | 齐鲁书社编审          |
|            | 黄朴民 |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导  |

### 第三辑

- |           |     |                 |
|-----------|-----|-----------------|
| 齐国威宣盛世    | 王京龙 | 山东理工大学齐文化研究院副教授 |
| 孙臆与《孙臆兵法》 | 孙建民 |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二系教授    |
| 稷下学宫与百家争鸣 | 于孔宝 | 《管子学刊》编辑部副教授    |
| 曾子与《孝经》   | 沈效敏 | 嘉祥县委党校教授        |
| 墨子与墨家学派   | 秦彦士 | 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
| 庄子与《庄子》   | 陈绍燕 | 山东大学《文史哲》编辑部教授  |
| 孔门弟子      | 修建军 | 曲阜师范大学孔子文化学院教授  |
| 子思与思孟学派   | 孔德立 | 曲阜师范大学孔子文化学院教师  |
| 孟子与《孟子》   | 查昌国 | 安庆师范学院历史系教授     |
| 荀子与《荀子》   | 孙聚友 | 山东社会科学院儒学所副研究员  |

### 第四辑

- |                 |     |                     |
|-----------------|-----|---------------------|
| 邹衍与阴阳五行         | 孙开泰 |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       |
| 田单与田横           | 姜 颖 | 山东理工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
| 秦皇东巡与汉武封禅       | 王克奇 | 山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
| 秦汉齐鲁经学          | 张 涛 | 北京师范大学古籍所教授、博导      |
| 滑稽大师淳于髡与<br>东方朔 | 孟祥才 | 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院教授、博导     |
| 齐鲁士人与秦汉社会       | 马亮宽 | 聊城大学历史系教授           |
| 郑玄与今古文经学        | 王承略 | 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院教授        |
| 山东汉画像石          | 杨爱国 | 山东石刻艺术博物馆研究员        |
| 建安文坛上的齐鲁<br>文人  | 张可礼 | 山东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导        |
| 王弼与膜晋玄学         | 裴传永 | 中共山东省委党校《理论学刊》编辑部教授 |

### 第五辑

- |                |     |              |
|----------------|-----|--------------|
| 诸葛亮            | 马凤岗 | 临沂师范学院历史系教授  |
| 左思与左棻          | 郑训佐 | 山东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导 |
| 簪缨世家琅邪王氏<br>家族 | 李伯齐 | 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

刘勰与《文心雕龙》	戚良德	山东大学文学院教授
贾思勰与《齐民要术》	张熙惟	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清河崔氏与北朝儒学	王华山	山东师范大学齐鲁文化研究中心博士
中古时代的兰陵萧氏	杨荫楼	曲阜师范大学孔子文化学院教授
颜之推与《颜氏家训》	秦永洲	山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唐初名相房玄龄	李永祥	济南教育学院中文系教授
唐代诗人与山东	陈元锋	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 第六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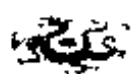
范仲淹与山东	郭学信	聊城大学历史系教授
苏轼与山东	刘乃昌	山东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导
晁补之与宋代晁氏家族	刘焕阳	烟台师范学院中文系教授
山东作家与北宋诗文革新运动	李善奎	济宁师专中文系教授
李清照	邓红梅	山东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导
辛弃疾	薛祥生	山东大学文学院教授
金元之际山东三世侯	赵继颜	山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丘处机与全真道	赵卫东	山东师范大学齐鲁文化研究中心副教授
山东元代杂剧	许金榜	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山东元明散曲	王少华	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 第七辑

李攀龙与“后七子”	石麟	湖北师范学院中文系教授
李开先与《宝剑记》	孟祥荣	湖北荆州师范学院中文系教授
抗倭名将戚继光	仝晰纲	山东师范大学齐鲁文化研究中心教授
梁山泊与《水浒传》	王恒展	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罗贯中与《三国演义》	杜贵晨	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兰陵笑笑生与《金瓶梅》	王平	山东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导
蒲松龄与《聊斋志异》	袁世硕	山东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导
孔尚任与《桃花扇》	徐振贵	曲阜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导
王渔洋与神韵诗	王小舒	山东大学文学院教授
清代山东名儒	田汉云	扬州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导

## 第八辑

郑板桥与潍县	孙敬明	潍坊博物馆研究员
--------	-----	----------



千古义丐武训	李 泉	聊城大学历史系教授
王懿荣与甲骨文	俞祖华	烟台师范学院历史系教授
威海卫与甲午战争	王守中	山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晚清山东新式学堂	曹立前	山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
晚清山东商埠	魏永生	山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
山东古代女杰	秦艳华	山东画报社副编审
山东古代科学家	林吉玲	济南大学文学院教授
山东古代书画家	任仲泉	山东工艺美术学院教授
山东著名藏书家	杜泽逊	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院教授、博导

## 第九辑

齐国史话	李玉洁	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导
鲁国史话	梁方健	烟台师范学院历史系教授
山东书院史话	李 伟	山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
山东对外交往史话	朱亚非	山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齐鲁佛教史话	江心力	聊城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齐鲁工艺史话	李新华	山东艺术学院副教授
齐鲁武术史话	李成银	山东师范大学体育学院教授
齐鲁民俗	山 曼	《烟台师范学院学报》编辑部教授
齐鲁民居	李万鹏	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院教授
齐鲁饮食文化	梁国楹	德州学院历史系教授

## 第十辑

鲁国故都曲阜	骆承烈	曲阜师范大学孔子文化学院教授
齐国故都临淄	曲英杰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院研究员
孟子故里邹城	王鲁英	山东师范大学马列部副教授
齐鲁名塔	刘守亮	山东省委办公厅处长
齐鲁名寺	高爱颖	中华女子学院山东分院中文系讲师
齐鲁摩崖石刻	赖 非	山东省石刻博物馆研究员
中国著名藏书楼		
海源阁	杨朝亮	聊城大学历史系博士
山东老字号	李平生	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齐鲁历史文化名人	张茂华	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齐鲁历史文化大事		
编年	郭墨兰	山东社会科学院《东岳论丛》编辑部编审

## 目 录

引言	1
一 福山望族	3
(一) 墓碑与纪念馆	3
(二) 故乡福山	6
(三) 出身于官宦兼诗书世家	8
二 求取功名	14
(一) 三岁时订了“娃娃亲”	14
(二) 幼承家学, 深受国学熏染	15
(三) 17年中参加8次乡试方中举人	18
(四) 会试联捷并旋点翰林	24
三 仕途生涯	31
(一) 由科举入仕	31
(二) 齐家与治平兼顾	37
(三) 三任国子监祭酒	42
(四) 厌倦官场	45
四 请缨抗敌	49



(一) 关心中日危局, 积极建言献策·····	49
(二) 请求回籍办理团练以迎击日军·····	51
(三) 含恨挥泪告别家乡·····	56
<b>五 文苑名士</b> ·····	58
(一) “好古成魔”, 多方搜罗文物古器·····	58
(二) 撰写多种金石学著作, 呼吁加强文物 恨护·····	64
(三) 关注文教事业, 撰请续修四库全书·····	68
<b>六 甲骨之父</b> ·····	73
(一) 发现与确定甲骨文的第一人·····	73
(二) 关于甲骨文最先发现者与最早发现时 间的争论·····	78
(三) 开辟中国学术新纪元的重大发现·····	85
<b>七 魔子苑建</b> ·····	90
(一) 临危受命任京师团练大臣·····	90
(二) 为国捐躯, 丹心照汗青·····	94
<b>八 甲骨显学</b> ·····	100
(一) 第一部甲骨著录书与第一部甲骨考释 专著·····	100
(二) “甲骨四堂”·····	102
(三) 新中国成立以来甲骨文的发现与研究 ·····	107
(四) 甲骨文流教到国外及著录情况·····	110

## 引 言

中华文明是世界古老文明之一，是世界上唯一延续至今的古代文明。在炎黄子孙的心目中有一个根深蒂固的观念，即认为中国有五千年的文明史，但这是需要加以证实的美丽传说。中国古史有确切纪年是共和元年（公元前 841 年）开始的，再往上就有很大的争论了。有的国外学者断言，中国文明只能上溯到公元前七八世纪。胡适声称：东周以上无史。顾颉刚则称：夏禹是一条虫。他们之前，关于夏商的历史更只能是种将信将疑的神话。三代文明的存在获得证据，要归功于近代考古学的发现。

正是甲骨文的发现，使商朝的存在走出神话，渐成一段日渐清晰的历史。如果没有这种古文字的重见天日及被解读，五千年大明史的说法就没有坚实的基础。这种古文字是在一百多年前被独具慧眼的山东福山人王懿荣最早发现的，它写在以往一直被人们当作药材的“龙骨”上面。甲骨文与流沙坠简、敦煌写经





和内阁大库档案一起，被并称为近代四大考古。它的发现开辟了中国学术的新纪元，也为齐鲁文化书写了灿烂的一页。

王懿荣首先发现甲骨文虽属偶然，但又有其必然性。他出生在官宦兼诗书世家，有坚实的国学根底，是当时一流的学者、著名的金石学家，有很高的鉴赏能力。甲骨文发现正值国难当头之日，尽管他是“甲骨之父”，是中国收藏鉴定甲骨文的第一人，但他还没来得及对甲骨文进行深入研究，便在庚子国难中以身殉国了。王懿荣既是伟大的学者，又是一个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其学术贡献与道德风范将永世长存。

## 一 福山望族

### (一) 墓碑与纪念馆

王懿荣（1845—1900），字正孺，又字廉生、莲生，晚年自号养潜居士，谥号文敏，《清史稿》有传。



王懿荣

道光二十五年六月初八（1845年7月12日）出生于福山古现镇东村（现划归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古现街道办事处）。古现村坐落在福山城西北30里处，村庄在不高的凤凰山北坡山脚下，村东北面临大海。王懿荣的故居与墓地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浩劫。随着共和国的历史走进新时代，也为人们重新认识王懿荣创造了条件。



1983年，中共中央理论刊物《红旗》第4期发表了题为《从爱国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评论员文章，文章说：

陈天华、王懿荣为了向外国侵略者表示抗议，不惜蹈海或坠井自尽，显示了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决心。……留下的爱国主义精神像丰碑一样，永远矗立在我们心中，他们将永远为中华民族的子孙后代所崇敬、所纪念。

这种评价在王懿荣的家乡产生了极大的反响。家乡人民从被当年平毁的故居与墓地的废墟中寻回了其墓碑、旌表碑、神道碑等大物，他们要为这位乡贤、先哲竖碑立传。1984年，福山区文管所与烟台市博物馆在古现镇一民居院内挖出埋在地下多年的王懿荣故居石狮一对，并从其墓址附近的深沟里找到了残缺的墓碑。2003年9月29日《大众日报》报导：当天在期台开发区古现街道办事处邱家村区的一处工地，发掘出了王懿荣的旌表狮的碑头，上面是雕龙图案，并雕有“圣旨”二字。据当地居民讲，王懿荣墓位于邱家村南约两公里处李家村东的小山上。约200米的山脚下，原有一道牌坊和一座皇帝对王懿荣的旌表狮。1966年，旌表牌被推倒后，村民们把牌头推到村南垒平塘，碑体被砸成几块垒了平塘。碑头后又被

推到村西当了桥桩，过了多年才桩发掘出来。古现镇是在 2003 年初刚从福山划归开发区的。

家乡人民不仅寻回了残缺的墓碑、旌表碑，还为他建立了纪念馆，以表达对这位先哲的崇敬。纪念馆在福山城内。1989 年 10 月 17 日，纪念馆在位于城里街的红十字会旧址落成并举行了开馆剪彩仪式。这是一处保存较为完整的古建筑群，占地 1358 平方米，拥有房舍 55 间，两进院落。前身为福山著名画家李程九的画室“听松斋”，是清末文人墨客集会的场所，李程九于 1927 年将其捐给世界红十字会作为福山分会会址。“王懿荣纪念馆”馆名由著名书法家赵朴初懿写。纪念馆里的匾额和楹联均出自国内著名书法家之手。大门两边柱子上的楹联是：

探骊得珠彪炳新学发夏史  
释生取义辉煌大节振民魂

馆内廊柱上的楹联有：

学富经纶志怀匣剑  
性耽金石名耀简编

刚正清廉为卫国保家当彪炳史册  
锦心慧眼识披图残甲得重现殷文



得先生慧眼斯文不丧  
逢盛世群贤此馆方兴

这些楹联对王懿荣作为伟大爱国者的忠烈志节与作为杰出学者的独具慧眼表示了钦佩与崇敬。

王懿荣纪念馆后又迁址于王氏庄园。王氏庄园建于清宣统二年（1910），占地 3600 平方米，三进庭院，有房舍 60 间，为王氏家族王滨所建。1999 年 6 月 18 日，设在王氏庄园的王懿荣纪念馆新馆举行开馆剪彩仪式。大门上方匾额上的“王懿荣纪念馆”馆名由时任国务委员的宋健题写，由著名书法家启功题字的“王懿荣纪念馆”馆名则置于大门右侧。该馆陈列展示王懿荣的遗物，包括平札、书信、著作、书法、甲骨文片等文物，现为山东省优秀社会教育基地、烟台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有形的墓碑、旌表碑或许会遭破坏、损毁，但王懿荣身上所体现出的爱国主义精神丰碑将会永存于炎黄子孙的心中。

## （二）故乡福山

福山现为烟台市五区之一，是一座濒临黄海的美丽古城。它北临黄海和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东、

西、南三面与芝罘、莱山、牟平、栖霞、蓬莱接壤。福山历史悠久，王懿荣家乡古现有两千多年前的牟子国国都遗址。牟子国原为鲁国属国，地处今莱芜市，因夹在齐鲁之间，屡遭战火蹂躏，乃东迁于此。牟子国国都故城呈不规则四方形，东西宽 550 米，南北长 523 米，壤墙为夯土构筑，现存壤墙根部宽 20 米，顶部宽 16 米，高度 6 至 8 米不等，有钱范、刀币等出土。福山县建置于金天会九年（1131），历代沿之。1983 年 11 月，改为烟台市辖区。秦始皇曾经于二十八年（前 219）、二十九年两次登临福山东面的芝罘岛，并立下了为自己歌功颂德的刻石；后又自琅玕使徐福入海采药，射杀巨鱼，现射鱼台遗址尚存。汉武帝东巡也曾登临此岛。王懿荣曾写过一首《芝罘刻石歌》，其中有云“秦始皇帝廿九年，东穷芝罘勒其巔”。

福山占称“栖地”，有“银福山”之称。这里依山傍海，物产丰富，气候温和，四季分明，风光秀丽，环境宜人。福山是名副其实的鲁菜之乡、烹饪之乡、厨师之乡，有着悠久的烹饪文化历史，福山籍的名厨、大师辈出，过去胶东一带流传着这样一句俗语：“东洋的女人，西洋的接，福山的厨师压全球。”即指福山厨师之多及有盛名。福山菜与济南历下菜、济宁孔府菜并立为鲁琅“三大支柱”。福山还是烟台苹果的重要产地，素称“苹果之乡”。

福山人杰地灵，被誉为“文化之邦，诗书世泽”。王懿荣在福山的始祖王忠原籍云南大理府云南县（今祥云县），明洪武年间任山东都转运盐使司下辖的登宁盐场盐课大使，他在福山为官几年后喜欢上了这块美丽富庶且人杰地灵的“福山”，决定定居于此。王氏家族遂在此繁衍子孙，渐成为福山的名门望族。

### （三）出身于官宦兼诗书世家

福山王氏一家确属官宦世家，先后录取翰林 6 名，进士 24 人，举人 58 人，贡生 58 人，秀才 357 人；出了三任封疆大吏；有父子三翰林、兄弟多举人之称，被朝野誉为“天眷其后，世泽蝉联”。乾隆曾称：父于三人俱为翰林，一门多显官，皆族办事，可谓世臣矣。自始祖王忠至王懿荣共 16 世，均在政界为官。

王懿荣二世祖王云，官知县（县名失考）。三世祖王俊，明景泰三年（1452）岁贡生，官知县（县名失考）。四世祖王纶，官江南上海县知县。五世祖王都，字世重，为礼部儒官。六世祖王国学，为名诸生。七世祖王久任，字风池，明万历十四年（1586）岁贡生，官山西大水县主簿，迁王府纪善，为官后理，东归时卖掉 30 亩田才偿还了路费。八世祖王道增，字仰池，礼部儒官，有子六人：鹭、铎、铎、铎、铎、铎。

珽、暉、典。王暉是王懿荣的九世祖，他嗜好读书，博览群经，名噪士林，却屡试不第。先在家中奉养父母，直至父母双亡。后随居长兄王鹭官衙，游历大江南北。王鹭，字辰岳，一字相居，清顺治十二年（1655）进士，历官户部主事、员外郎、刑部郎中、四川松威道、直隶口北道、太常寺卿，直至江西巡抚、闽浙总督、户部尚书的高位，为官清廉。在闽浙总督任上，康熙曾赐书“养素”二字匾额一幅加以褒奖。在王懿荣纪念馆展厅里，陈列着王鹭书写的一副对联：

有子能文何必贵  
为官致富不如贫

王鹭的这副对联，强调教子孙注重文采，居庙堂务必廉洁，是难能可贵的。王暉有子一人，名符。王符，字远征，号溟波，是王懿荣的十世祖，官云南云龙州知州、四川成都府知府、大理寺卿等。王符有六子，均为朝廷命官，其中次子王从绳，字司直，是王懿荣的第十一世祖。王从绳有四子：衍绪、广绪、景绪、坦绪。王景绪，字昆瑞，是王懿荣的第十二世祖，举人出身，官福建永春直隶州州同、大田县知县、云南鹤庆州、镇雄州知州。王景康有子二人：孔长、允长。王允长，字子惟，又字丹谷，其子王兆琛





即为王懿荣的祖父。

王兆琛，原名北玺，字叔玉，一字西坡。生于乾隆五十二年（1786）。嘉庆二十二年（1817）考中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国史馆纂修兼总纂官，历任知县、会试同考官、监察御史、四川成都府知府、重庆府知府、江西督粮道、安徽宁池太广道、甘肃按察使、四川布政使，并于道光二十六年（1846）升任山西巡抚。他是王懿荣的祖先中第三个成为封疆大吏的人。道光二十九年（1849），进御史弹劾。山西巡抚历来兼盐政，任内私受盐商节礼银，其家人贪索规礼，门卫、轿役仗势滋事，经钦差户部右侍郎福济、刑部左侍郎陈孚恩查问，将王兆琛革职抄家充军新疆。王懿荣的祖母于太夫人受此打击，一病不起，于当年十二月二十日（1850年2月1日）辞世。他的银母也出身名门。于太夫人原籍文登，其五世粮于可托（字阿辅）是顺治十二年（1655）进士，官至户部右侍郎等职，其粮父于业与父亲于颖发均曾任江苏、江防同知一职。于太夫人生于乾隆四十八年正月初十（1783年2月11日），享年67岁。王兆琛病故于咸丰二年（1852），享年67岁。辞世后其灵柩由伊犁入关，行至陕西为军事间阻，滞留于蒲坡20年后，方归葬于福山故里。

王兆琛有五子：伯润、丙坤（原名伯涛）、伯平（原名伯桂）、伯淳、祖源。王祖源即为王懿荣的父

亲。

王懿荣的母亲谢太夫人，是福山县城西关谢牧之的太儿。谢牧之，字准夫。嘉庆十八年（1813）举人，道光制科孝廉方正。任广东新兴县和顺德县知县。道光二十一年（1841）任第34任澳门同知，同知为府的副职。当时，澳门作为广州府直辖的一个特殊区域。谢家也是福山县的望族。谢氏原籍江南省宣城（今属安徽）。始祖谢魁在军队中任职，明洪武年间调防登州，后定居于福山。九世祖谢琰教子有方，他的两个儿子谢乃实、谢乃果于康熙二十七年（1688）同时考中进士。谢乃实有三子：长子谢光纶，举人，官河南宜阳知县。次子谢光纪，康熙五十七年进士，官广西官川知县。三子谢光祖，举人，官刑部主事。谢光祖的儿子谢隆澳即谢牧之的祖父，岁贡生，候选训导。谢牧之的父亲谢宜庄，乾隆年间监生。王懿荣正是在他外祖父家开始接受启蒙教育的。

王家不仅是官宦世家，而且是书香世家。王懿荣的先祖中不乏博闻经史、精研学问并有著述行世者。九世祖王鹭行世的著述有《大司农奏议》1卷、《养素堂文集》8卷、《诗集》6卷、《义圃传家澳》8卷。另外，他还与同县鹿兆甲等人合纂《福山县志》（康熙）12卷。十世祖王特酷爱图书，且善诗、古文、词。著述有《王大常集》2卷，牧人王懿荣所编辑的《天城阁丛书》。他在任云南龙云洲知州时，还纂有

《云龙州志》。王懿荣的祖父王兆琛精通经史，精于书法，尤长于文字音韵学，公务之余致力于著书立说，有多种著述传世，包括《正俗备用字解》5卷、《经义测海》2卷、《重韵辨义》4卷、《奏疏存稿》5卷、《御史奏疏》1卷、《巡抚奏疏》4卷及《眇堂书屋集》等。《正俗备用字解》被收录在《天壤阁丛书》中。父亲王祖源精于书法，家藏金石甚多，善于鉴别真伪，著作有《判花轩集》2卷、《尔雅直音》2卷、《声调之谱》、《渔洋山人秋柳诗笺》、《明刑弼教录》等。王祖源在近代武术史上也值得提上一笔。咸丰四年（1854），他随在陕西为官的兄长（历官陕西延长、南郑、蒲城、长安等县知县）居住时，认识了力士周斌，三人同游少林寺，在寺中住了三个月得少林《内功图》与《枪棒谱》西归，经删节后于光绪八年（1882）刊印，另定名为《内功图说》，其内容包括十二段锦总诀及图解、易筋经图解等。

在王懿荣的先祖中，还有一位能著书立说的才女，她就是王懿荣的从祖姑王照圆。王照圆（1763—1851），字瑞玉，号值侗。她的文夫是清代著名学者郝懿行。郝懿行（1757—1825），字恂九，号兰皋，山东栖霞人，清嘉庆年间进士。王照圆既是解生活上的伴侣，又是其学问上诤友，俩人相互切磋，疑雅共析，如师如友，有“高邮王父子”（王念孙与王引之）、“栖霞郝夫妇”之称。郝懿行一生治学，著述甚

丰，已刊与未刊的总计有 60 余种之多，重要者如《尔雅义疏》、《春秋说略》、《宋琐语》、《宝训》、《蜂衙小记》、《燕子春秋》、《海错》等，多收在《郝氏遗书》里。王照圆的著作有《列女传补注》、《列仙传校注》、《梦书》、《闺中文存》等。夫妻二人相互支持，并进行学业上的合作，共同的著作有研究《诗经》而写成的《诗问》及《诗说》二书，此外还有汇集平日夫妇俩的唱和诗而成的《和鸣集》。

王懿荣在自己的书信和著作中屡提及其从祖姑及从祖姑丈，可见深受他们的影响。



## 二 求取功名

### （一）三岁时订了“娃娃亲”

王懿荣的出生，伴随的是国家与家族、大家与小家的同时变故。他生于道光二十五年（1845），在此前的五年即道光二十年（1840），英国侵略者发动了鸦片战争，以武力强迫清政府在道光二十二年签订了屈辱的《南京条约》。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帝国主义侵华战争与第一个屈辱的不平等条约，它们是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开始；在此后的四年即道光二十九年（1849），他的祖父王兆琛获罪被遣戍新疆并抄没家产，福山王氏一家家道中落，从显赫的高门望族败落为困顿的穷困寒门。

王懿荣是父母的长子，但不是祖父母的长孙，大排行是第十三。不过，他在诸孙中最深得祖父母钟爱，懿荣之名是其为官山西的祖父给起的。他年方三岁的时候，老祖母于太夫人从乡党亲戚中了解到蓬莱黄宗敬次女黄兰资稟端淑，性情柔顺，有大家闺秀风

范，遂为爱孙议亲。黄兰于道光二十一年六月三十日（1841年8月15日）在其父亲就任的刑台典史官署中出生。父黄宗敬，字熙庭，山东蓬莱人。曾任直隶顺德府刑台县典史。王夫人，为乾隆时举人、江西知县王荣发女，同为蓬莱人。曾祖父黄岩，乾隆五十二年（1787）丁未科进士，官广西平南县知县。祖父黄璿光，附贡生，江西南城县县丞，署南城县知县。黄兰七岁时，随母亲回到蓬莱，住城内上马台旧宅。于太夫人请媒人到黄家提亲。王夫人修书将此事告知在保定的黄宗敬，其时，黄兰的祖父刚从江西南城县知县上卸任，归养于儿于在保定的寓所，闻知此事，对儿子说：“吾郡大姓，惟福山王氏德最厚，故其世泽亦最长，子孙蕃昌，科第绵衍。中丞公第五子尤孝友笃厚，其后必大，可许之。”中丞公第五子即王懿荣的父亲，黄家料定其子必能延续福山王氏官宦兼诗书世家的世泽，自然痛快地答应了这门亲事。这样，三岁的王懿荣与七岁的黄兰订了“娃娃亲”。俩人后于同治元年（1863）在保定完婚。

## （二）幼承家学，深受国学熏染

王懿荣五岁时遭家庭变故，他家的家产可以被抄没，但其作为文化世家的家学背景，却不会在旦夕之间被毁坏、阻断。就在这一年，他的父亲还中了道光

己酉科拔贡。深厚的文化底蕴使王懿荣从小接受寒门子弟所不能有的良好家学氛围与优质启蒙教育，这为他成长为近代文化史上的一位文化巨人奠定了很好的基础。

道光三十年（1850），六岁的王懿荣开始接受启蒙教育。他的前几位老师都是外祖父家的人。第一位启蒙老师为外叔祖谢学敦（学庵）先生，庠生。他幼年时读书的私塾，设在本门长房一处叫“有棣堂”的房舍，内有“遗书接”，为藏书之地，因其爱登接取书阅览，大人对他还多有防范。王懿荣后来中了进士回乡探亲时，正好借居这一幼年时读书的场所，回首当年，往事历历在目，他在《天壤阁杂记》中追忆了孩提时在此读书的情景，颇多感慨。

咸丰三年（1853），九岁的王懿荣受业于母舅谢琴南（字焕昭，廪生）、谢价人（字应劭，庠生）西先生。咸丰六年（1856），父亲王祖源入京供职兵部主事，12岁的王懿荣与母亲一起留居福山老家，寄居祖父家，就读于台子街同理王氏家塾，受业于母舅谢应起先生。谢应起，字虞臣，道光己酉科的拔贡，曾任河南宜阳县知县。咸丰八年（1858），14岁的王懿荣受业于表伯张恩煦先生。张恩煦，字墨林，咸丰庚辛进士，曾任直隶乐亭县知县。次年，他先受业于母舅谢荣宗先生。谢荣宗，字仁山，庵生。也是在这一年，他和母亲、弟弟、妹妹一起入京，并受业崔穆

之先生。崔穆之，字清如，山东茌平县人，道光己酉科拔贡，于本年刚中顺天乡试举人，又于咸丰十年（1860）联捷考中进士，后官至翰林院编修、湖南岳常澧道等职。王懿荣的弟弟王懿霖（字仲铭）、王懿荣（字信卿）和妹妹张夫人分别于道光二十九年（1849）、咸丰元年（1851）、咸丰七年出生。

咸丰十年（1860），此时清政府面临内忧外患，外有英法联军入侵，内有太平天国运动与捻军起义。北方山东等地有声势浩大的捻军起义。王祖源奉旨回籍办团练。王懿荣随父到济南，就读于泺源书院。同年侍父回北京。这一年，他年方16岁。二十八年后，44岁的王懿荣重游济南，他对人事代谢、身世枯荣、家国兴衰又颇多感慨，写过一首《重到济南》：“二十八年心事违，忆随此地策征骅。先君到处留诗墨，重对湖山泪满衣。”想起初到济南之时，他的父亲带着全家在家道中落后艰难政涉，今日自己有所成就，但父亲已作古，回首艰难的人生历程，复杂的心情怎能言表？不过，在济南不到一年的读书生清还是给他留下了美好的回忆。如他结交了两个很要好的同学即诸城的尹彭寿（字慈经）、拔县（今莱州）的张士保（字菊如）；还有济南“四面荷花三面柳，满城春色半城湖”的如诗如画的美景，他也记忆犹新。重游济南时他另有一首《观明湖渔者》，诗云：“几番秋雨几番风，一样渔簑钓不同。只解笑人身人画，那知我亦画





图中。”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历经几度春风秋雨，但大明湖如画美景依然，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咸丰十一年（1861），王懿荣 17 岁。这一年他受业于明广先生。明广，字仲居，山东禹城人，道光二十三年（1843）举人，候选知县。

幼年、少年时代的王懿荣，先后在福山、北京、济南师从八位先生，并入过书院，接受了多种风格的后蒙与初级教育，尤其是深受他祖父及父亲及外祖父一家的影响。他后来从事古文字及金石文物的研究，就是受家庭影响的结果。他读书的兴趣广泛，不屑于章句、帖括，但为求登上仕途，又必须苦读四书五经，这文体也及大人对其登览遗书楼严加防范的原因。在那个时代，“一心只读圣贤书”，死记硬背经文以应付科举考试，这是长辈、先生对学子的期望、要求。不管是否喜欢，不管是否有用，为了个人命运与家庭的荣耀，他还是得走科途求仕之路，还是得去死记硬背帖括经书。经过十多年的寒窗苦读之后，王懿荣登上了更为艰难的仕途跋涉之路。

### （三）17 年中参加 8 次乡试方中举人

同治元年（1862），18 岁的王懿荣参加了第一次乡试，开始走上艰辛的科举求仕之路。仅乡试他就参

加了八次，历经 17 年的努力，才中了举人。

科举选仕制度自隋炀帝大业二年（606）试行，唐朝因袭此制，增加科目，对其进行初步发展。宋代扩大取士名额，严格考试规程，逐渐完善形成定制，为元明清三朝继承，直到 1905 年寿终正寝，前后长达一千三百余年，是我国封建时代实施最久，也是最重要的官员选拔录用制度。清代，读书人经过县试、府试、院试三级考试，合格者为生员。生员经过省级乡试，合格者称举人。举人再参加京师的会试，合格者为贡士。贡士经过在皇宫里举行的殿试，成为进士，取得进士资格的都可以授予官职。各级考试的主要内容是八股文、经论、五言六韵诗等，尤其是看八股大作得如何。乡试正科是每三年一次，于子、午、卯、酉年的八月份在京城及各省举行，称“秋试”或“秋闱”。正科之外，遇到庆典加科，称为恩科。主持乡试的有正、副考官及同考官（房考官），试卷由房考官批阅，加上评语后推荐给主考官，由主考官决定取帝和名次。

王懿荣参加的第一次乡试是同治元年（1862）的壬戌恩科的顺天乡试。房考官为许其光（字涑文）先生，他很欣赏王懿荣所作制文，嘉许其为奇文，以北元（清代以顺天乡试、江南乡试为“北闱”，“南闱”，北闱第一名为北元）请于主考官，未获批准。许其光未争北元以外的其他名次，王懿荣遂落第。



次年，王懿荣受业于周悦让先生。周悦让，山东莱阳人，字孟伯，道光二十七年（1847）丁未科进士。周悦让治经有很深的造诣，虽本于汉学，但又能兼收并蓄，撰著有《通经》11卷、《子通》20卷、《增修登州府志（光绪）》69卷、《史通》20卷、《俊游庵版记》等，其中，《登州府志艺文志》由周悦让撰，王懿荣校补。王懿荣以同郡之谊师事周悦让，两人性情相投，从学者获益匪浅。是年，长女在保定出生，命名保生，生母为黄夫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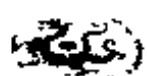
同治三年（1864），岳父黄熙庭在直隶任邱县知县任上，捐办天津海防，部议给奖。这项奖励可以移给自己的于莱亲属。黄熙庭将此奖给予王懿荣。王懿荣被兼分到户部任额外（候补）主事。是年初，黄夫人撰长女由保定来到北京，随侍公公、婆婆于京宅。在此前后，王庵荣痛失多位亲人，使祖父道贬及辞世以后隶道中落造成的不幸雪上加霜。他的弟弟王懿懿于同治四年（1865）歿于京师，年仅17岁，他的外姑王太夫人与长女王保生于次年在京师病故。次女王崇瑛（乳名定住）、长子王崇燕（字翼北，又曰孟喜）、次子王崇烈（字汉辅，亦曰火传）则分别于同治五年（1866）、同治七年、同治九年降生，均为黄夫人所出。爱弟王懿霖去世时，王懿荣答应为其立嗣，次子王崇烈后过继给王懿霖。这些年中，王氏一家家计是十分困难的，乃至他祖父辞世二十年后方归

葬故里。但家境的困顿更能激发王懿荣发奋苦读，为登榜以显扬家族而不懈努力。乡试难，而顺天府的乡试则族上加难，因为参加顺天府乡试的不仅有直隶省的应考省，还有各省督抚推荐前来应考的外省优秀者，这使得竞争更趋于激烈。在第一次参加乡试失败后，王懿荣发起了一次又一次新的冲击，在艰辛的求仕道路上艰难跋涉。

同治十二年（1873），王懿荣 29 岁。是年秋，他又一次参加顺天府乡试，中副贡第一名。此次乡试主考官为协办大学士、刑部尚书、翰林院掌院全庆（那拉小丁），副考官为吏部右侍郎童华（字薇研）、左都御史胡家玉（字小遽）、户部左侍郎潘祖荫（字伯寅），同考官员是礼科给事中胡毓筠（字介卿）。清科举制度规定，在正榜之外录取若干名额为副榜，可作为员生，称副贡。这也是正途出身的资榜，而且不再是本府、州、县的生员，可直接升入国子监读书。虽只中副贡，但这毕竟前进了一步。

光绪元年（1875）和二年，王懿荣连续参加了乙亥恩科及丙子科故顺天府乡试，均名落孙山。房考官分别是鲁琪光（字芝友）和樊恭煦（字介轩）。至此，王懿荣参加山东顺天应试共七次而不中。科场的磨难，不仅使王懿荣凄苦郁闷，也使黄夫人伤心不止，病势加重荫终至不治。

在这艰难的跋涉途中，夫妻俩患难与共，相濡以



沫。黄夫人从同治三年（1864）来到京师以后，撑起了持家的重任。她奉养公婆于左右，亲小姑如姊妹，视诸叔如兄弟，虽清苦，但全家和乐融融。黄夫人在生次女时失血过多，又在同治十年得乳疾，为庸医所误，流血如注，历三年不愈，体气大亏；后又于同治十二年突患伤寒，又误于医药，使病体羸弱更甚；还要为丈夫的多次落第及身体日夜操心，伤痛不止，于是心力交瘁，愈益不支，终于光绪三年（1877）病逝于京寓兵部洼中街，享年 37 岁。可以说王懿荣在科场上的得失成了黄夫人心中最大的牵挂，最伤心的病痛。一连串的失败使她痛心疾首，如同处在无休无止的噩梦之中。每到重阳“秋闱”放榜之日，夜半闻街巷有唱黄题名录的叫喊声，黄夫人辄以被子蒙面，觉得此声音凄凉，与秋风一样凄厉，不忍卒听。一次又一次揪心裂肺的痛苦体验，使黄夫人每到秋冬之交必然会习惯性地大出血，百计不能止，沉痾不起，一次比一次加剧。在她的有生之年，她看到了自己的丈夫七次参加会试但均落第，而当王懿荣在第八次参加会试中举时，斯人已逝，这又是多大的遗憾。

黄夫人牵挂着王懿荣的科场成绩，并尽最大努力为他苦读求仕解除后顾之忧。王懿荣也是一边心系科场，一边挂念着正染重病的妻子，每次考罢，他均急忙赶回家中服侍夫人的汤药及料理家务。后来他有回忆：

乙亥、丙子两次（乡考），正值妇连年病笃之日，余每场归家，便料理医药及儿女衣食等事。

王懿荣对黄夫人心存巨大的感激与歉愧之意。他在《诰封宜人元配蓬莱黄宜人行状》中对黄夫人的言行、性情、品德作了深情的回忆和很高的褒奖。称其当王家中厄之际，夫之若素，勤俭持家，珍俭物力，一丝一粟，无所废弃，积十五年如一日；赞扬她严格要求子女，“子所嬉戏玩物，虽琐屑不使毁弃暴殄”，也由于她的严格管教，子女虽小，但对家里收藏的文物不敢接近；赞扬她除倾心相助自己求取功名，还在家境清苦的情况下支持自己与名士交游，家里几乎每日有诗酒之会，表现出了“拔钗沽酒之风”，还支持自己搜求文物，为解用度之急需乃至常质押首饰。王懿荣对关心、理嬉自己的黄夫人，只看到自己七次乡试落菜，而在她歿后两年自己终于在参加第八次乡试时中举并旋成进士，是很痛心疾首的。他称之为是“歉奇如此”，并引述古人“诚知此恨人人有，贫贱夫妻百事哀”的诗句表达自己的伤感。

光禧五年（1879），王懿荣 35 岁。这年状天，他又一次应顺天乡试，这是他第八次参加乡试，这一次终于考中嬉 31 名举人。此次乡试主考官为徐桐（字

荫轩，体仁阁大学士），副考官为费志和（字莫叔雅，尚书）、殷兆镛（字谱经，侍郎）、钱宝廉（字平甫，侍郎），房考官为缪荃荪（字小山，翰林院编修）。考中举以后，还有复试，在保和殿举行。王懿荣认真地完成四书文《宰我子贡善为说辞》与五言八韵诗《赋得播厥百谷》。复试考卷经阅卷大臣批阅后进呈皇上，由皇上钦定为一等第七名。历尽 17 年的艰辛岁月和八次乡试的苦苦冲刺，终于有了今天这样的结果。此时王懿荣的心情是很复杂的，可以说是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喜的是付出艰辛之后算是有了回报，也为今后在仕途上跋涉奠定了很好的基础；忧的是前生十分关心丈夫功名的黄夫人已在两年前仙逝，无法共同分享自己金榜题名的喜悦了，黄夫人是带着深深的遗憾而走的。“秋闱”报捷后，王懿荣旋赴“春闱”，为自己的前程，为王氏家旋的荣誉，也为告慰黄夫人的在天之灵。

#### （四）会试联捷并旋点翰林

光绪六年（1880）王懿荣参加庚辰科会试。科举聚无跋涉士子趋于求取功名于一途，一级一级往上考，越往上也就越难，正如梁启超在《公车上书请变通科举折》中所说的：“邑聚千数百童生，擢十数人为生员；省聚万数千生员，而拔百跋涉十人为举人；天下聚

数千举人，而拔百数人为进士。”中了举人还只是登上了科举仕途中的一个重要台阶，“天下聚数千举人，而拔百数人为进士”则是科举选士中更激烈、更关键的又一个台阶。会试也是三年进行一次，于辰、戌、丑、未年的三个月份在京城举行，称“春试”或“春闱”，各省举人皆可应考。正科之外也有恩科，在乡试的第二年进行。王懿荣在参加乡试时屡遭挫折，屡屡令人想到秋风的凄厉，可参加会试却是一举成功，可说是春风得意。

会试由礼部主持，会试的考场称为贡院，考试一连九天，是在会试之年的阴历二月初七到十五。在九天中考三场，会试中的第一名为会元，其余为贡士，民间称进士（《大清会典》规定及第殿试考才能称进士）。王懿荣参加的庚辰科会试，考官为颜景颜（俭卿）尚书，副考官为许应騄（昌德）侍郎、素麟书（文）尚书、翁同龢（叔平）尚书，房考官为翰林编修陈启泰（伯平）。三场考完之后，王懿荣焦灼地等待着发榜之日。这一天，他起了个大早赶到榜前，发现自己中了第156名贡士。房师陈启泰为他写的推荐评语为：

跌宕纵横，不可一世，信是才人之笔。《易》旁推交通，《书》畅茂，《诗》古雅，《春秋》有断，《制礼》考据横确，出笔俱傲兀不群。渊懿



赅洽，足征讨论功深。

合观十四艺，于经学、史学、小学、天文、輿地、金石均能通贯，非以摭拾得来，望而知为泽古之士。

发榜几天后，王懿荣参加了复试。复试在保和殿进行，贡士们由东华门进入保和殿。王懿荣提交了一篇四书文，题为《伊尹以割烹要汤》；还有一首五言八韵诗，题为《赋得日久蓬莱深》。他顺利通过了复试，被确定为一等第 35 名。

复试之后是殿试（廷试），在会试的同年旧历三月举行。会试录取的人须经殿试定等第。殿试还在保和殿，考试内容是“策对”。殿试皇帝亲临主持，阅卷大臣称为读卷大臣，意为皇帝读卷，共有八位。经过殿试以后，由皇帝和读卷文臣确定等第。一殿分为一甲、二甲、三甲。一甲三名，第一名状元，第二名榜眼，第三名探花；二甲若干名，第一名传胪，其余称进士；三甲若干名，世通称为进士。另又将一甲三名确“进士及第”；二甲若干名，赐“进士出身”；三甲若干名，赐“同进士出身”。王懿荣在《对策》中大胆直言，围绕吏治倡廉、人君躬行节俭、懿军经武三件国家大事，阐述自己的见解。这三个问题在当时很有针对性，是当时亟待解决的当务之急。关于吏治问题，王懿荣提出“安民必先察吏”，治吏“端在大

吏”，上梁不正下梁歪，如果大臣不廉，“则汲引私人，偏护僚属”，小吏会更加贪事。关于人主躬俭，这与治更是相关的，最高统治者如果穷奢极欲，官场自然贪污成风、贿赂公行，要肃清吏治，君主必须“躬行节俭为天下先”，他希望清统治者能像历史上的汉高祖、汉文帝、汉景帝、唐太宗、宋太祖、明太祖等君主一样，节俭亲民，作天下的表率。关于整军经武，他提出“统筹设兵驭将之法，以为制治保邦之要”，要大大提高军队战斗力，做到“有不战，战必胜”。王懿荣公忠谋国之心昭然可鉴，但当时日益走向廉败的清王朝已不可救药，只能是让仁人志士仰天长叹了。殿试三天后，读卷大臣将试卷呈于皇帝，由皇帝钦定等第。当时光绪帝尚未亲政，这一切由慈禧太后定夺。此次殿试王懿荣的结果是二甲第 17 名，赐进士出身。

殿试之后，新中进士还要在保和殿进行朝考，决定能否成为庶吉士。朝考只一天，只作策问一道，写的卷面和格式和殿试一样，由礼部办理呈给皇上。朝考合格的成为庶吉士，进入翰林院特设的教习馆学习三年，由学士、侍郎任教习，结业后经散第考试，或留翰林院任编修或检讨，将来可选任为学台或副大主考等美差，或分发各部任主事，各省任知县、知府，他们有实际的官位和俸禄，外放用不着候补，各省督抚藩台对这些人须尽先予以任用。考取庶吉士，便是

翰林院的翰林，故称“点翰林”，而皇上身边的某些官差只有翰林才能承当，所以，成为庶吉士是在仕途中飞黄腾达的重要一步。未考中庶吉士的，虽也能做各部主事、外省知县之类的官员，但须候缺，且在此期间，只有官衔，而无薪俸，十分清苦。王懿荣提交的翰考卷为《取财于地取法于天论》、《耕藉田疏》和一首题为《赋得荒郊花柳遍》的五言八韵诗。朝考柳晓，王懿荣为一等第三名，授翰林院庶吉士。

王懿荣会试金榜题名时，已是 36 岁。他从六岁开始在大人的严厉管束和多位饱学之士的谆谆教诲下寒窗苦读，从 18 岁开能带着家族的沉重期望与黄夫人的殷切关注艰难拼搏，其间有多次铩羽而归的惆怅，有多位亲人悄然离去的凄凉，有亲人天各一方的离愁，有自己重病不起的悲伤，这条路可真是布满荆郊，布满沟沟坎坎。三十年的苦读与十八年的打拼，付出总算有了回提。相比那许许多多皓首穷经而与科名无缘的儒生，王懿荣觉得自己是幸运的，那首《赋得荒郊花柳遍》的五言诗，描绘了“弥望花兼柳，春郊已得芳”的一片大好的满目春光，花红柳绿，莺飞蝶舞，飞英满天，郊絮缭乱，春雨绿绵，碧水荡漾，轻烟护玉，十里飘香，使人有如闻其声、如见其色的身临其境的感觉。这或许可以反映他熬过人年满难后的如沐春风的心境。

中了进上，点过翰林，照旧例是要荣归故里，衣

锦还乡。王懿荣是 15 岁时随母亲来到北京的，住在父亲的兵部主事任所。咸丰十年（1860）父亲奉旨回籍办团练，他随父亲回过家乡登州，还曾在济南读书。同治六年（1862），他与黄夫人在保定成亲。同治十一年，父亲简成四川龙安府知府，他没有随往。也就是说自从 15 岁入京后，除在济南、保定短驻外，一直住在北京，而长驻京师主要是奔波于科场。简今进士及第、保袍加身，总算如愿以偿，也可告慰于故里乡亲与为官而川的父老。光绪六年（1880）年底，新科进士王懿荣冒着严寒，回故里省亲、祭祖。旧历十一月份他由京起程，经直隶入山东。十二月，抵达故里占现村，借住他幼年读书的处所，本门长房的有棣堂。王懿荣的返乡是很低调的，没有荣归故里的趾高气扬。当地甚至有这样说法：王懿荣途经芝罘返福山，福山县令得知此消息，立即派出一队轿夫前去芝罘迎接。轿夫走到珠玑村附近，迎面而来简是一个骑驴的布衣人，此人只顾辛牵缰绳赶路，未见过未故一乘大轿。轿夫们耀武扬威，横冲直锦，竟将骑驴人简倒，跌了横身尘土。骑驴人爬起来质问：“役吏，为何将我撞倒？”轿夫班头对布衣人横眉冷眼呵斥道：“什么？你挡老爷的轿车还敢质问？你知道吗，这是去接京官的大轿，快快上籍！”说道吆三喝四扬长而去。布衣人正待上前讲理，但见轿夫已经远去，也只得连连摇头，苦笑一下，骑驴继续赶路。轿夫们来到



芝罘驿站，一打听京官住处，方知京官已自己骑驴返故里，才知道方才撞倒的正是王懿荣。这种说法未必可信，但有一点是可信的，王懿荣此次归故里确实没有大声张。究其原因：一是他屡经科场坎坷，有太多感慨，心中或许有宽慰之感，但早已把荣耀看淡；二是他一路上和到家乡后所关心的不是显示荣耀，而是搜求文物；三是自己最直接的亲人并不在故里，妻子黄夫人已经过世，而父母远在四川，自己又亲历了家族由荣而衰的磨难，而对这种情况，他的心情自然是很复杂的。这时他感到欣慰的是，以往迫于科举压力，他的读书与爱好要受到很大的限制，而今他对金石古物的嗜好总算可以倾注精力了。次年旧历二月，王懿荣经烟台北上返京。返京路上，依旧是卖力于搜求文物。同年，他还请假由京赴川探望父母，一路往返还是关注收藏金石古玩之事。

王懿荣连同家人十八年含辛茹苦求得功名本是为了仕途，但人仕之后官场的生活他能返应得了吗？他的心里充确着疑问。

## 三 仕途生涯

### （一）由科举入仕

光绪九年（1883），王懿荣在翰林院庶吉士教习馆肄业，取得第一等第26名的成绩，授职翰林院编修。他虽任过户部额外主事，但那非正途，所以说自此才算正式地进入了官场。十一月二十六日（12月27日），移居东安门外翰拉胡同11号新宅。该宅原是长白敏恪公广寿的故居。翰林院为当时中央最高学术机构，自明朝中期以后就有“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阁”的说法，“点翰林”意味着要在皇帝身边当差。他在皇宫附近择居就是因为它离皇宫近，上朝方便。他曾说：“为翰林必当供奉内廷，得地如此之在两掖，方足以侍滴漏候鸡鸣也。”开始是租寓，继则购得之。此后，他就一直住在这皇。

同年，召试南书房，未被录取，而被任命为国史馆协修官。

光绪十年（1884），王懿荣已是40岁，无论从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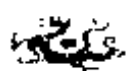
阶还是学识角度，都应说是事业有成了。是年又被任命为会典馆纂修帮总纂官。国史馆与会典馆都是清廷的修史机构。国史馆属翰林院，主要任务是纂修清史。康熙二十九年（1690）设“三朝国史馆”，编写清太祖、太宗、世祖前三朝历史，书成后撤销。乾隆元年（1736）复开史馆，撰修五朝历史（加康熙、雍正两朝），竣功后亦裁撤。三十年（1765）再设，自此成为常设机构。会典馆则是专修清代有关典章制度史书的机构。王懿荣恪尽职守，尤其是在撰修《光绪会典》时投入精力不少，曾得褒奖。

光绪十年二月八日（1884年3月5日），王懿荣连上两道奏疏，即《请复古本〈尚书〉附入〈十三经注疏〉与今本〈尚书〉并行疏》与《更定京员津贴银两名目疏》。后一奏疏指出，朝廷允准各省督抚请筹外销闲款为京官津贴。有不择名目及未作正开销者，有滥筹、滥发之撤，建议要严格控制，“妥筹闲款，更定名目，作正开销，康维士风，亦端政体”。他自己身为京官，也可以拿到这笔京员津贴，但还是建议要从严控制，要名正言顺，不希望乱取滥拿。由于此项津贴涉及广大京官的利益，所以他估计“此疏一出，望者嫌怨，议者违驳，至所讥弹”，自己的意见肯定会遭怨恨、反驳、讥讽，但为了遏制“一世士风，江河日下”的状况，表示决不随波逐流，遭到非议“亦所不避”。这一奏疏中所体现的思想与他在殿

试策对中所表达的安民必选察吏、治吏以廉为先，才与廉两者以廉为本的思路是一脉相承的。他认为京官是全国官吏的表率，京官是否清廉关系到士风政体。需要指出的是，他不是说说而已，在当时腐败成风的习气下，他做到决不同乎流俗，一直清廉自守，过着清廉的生活，为士林所推重。

稍后，王懿荣又奏上《醇亲王位分尊崇，请恪遵御论收回成命疏》。醇亲王奕譞，字朴庵，是道光皇帝的第七个儿子。道光的四子奕訢继位，是为咸丰皇帝。道光帝第六子奕訢被封为恭亲王。在奕訢被封为亲王的同时，奕譞被封为醇郡王。咸丰九年（1859）受命在内廷行走。咸丰十一年（1861）北京政变发生时，站在太后、奕訢一边，鞍前马后，尽力不少，得到慈禧太后信任。迭授都统、御前大臣、领侍卫内大臣，管神机营，同治十一年（1872）晋封为醇亲王。光绪元年（1875），他的次子载湉被慈禧太后选为皇帝。奕譞是慈禧的妹夫，慈禧选中侄儿兼外甥的载湉入宫，是因为载湉年方四岁，自己可以败续垂帘听政。权欲极强的慈禧在与奕訢联手发动政变掌控清廷最高权力后，很快发生了矛盾。早在同治四年（1865），她就借机下旨革去奕訢一切职务，后虽迫于压力恢复其首席军机大臣的职务，但议政王的称号从此取消。在以后的日子里，她操纵着朝局，运用着权术，处处削弱奕訢的力量，而奕譞被作为抑制、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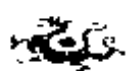


除、取代奕訢的工具加以利用。慈禧为了笼络奕訢，多次降旨予以厚待。光绪元年（1875）下诏赐奕亲王“世袭罔替”的殊荣。光绪五年（1879）赐食亲王双俸。光绪十年（1884）终于发生了以奕訢取代奕訢，老七顶悼老六的甲申朝局之变。这年三月十三日（4月8日），全部罢免奕訢、宝璽、李鸿藻、景廉、翁同龢五个军机大臣，重新组成以礼亲王世铎为首，由户部尚书额勒和布、阎敬铭，刑部尚书张之万及孙毓汶等人参加的新的军机班子。三月十四日（4月9日）又发布上谕：“军机处遇有紧要事件，著会同醇亲王奕訢商办，俟皇帝亲政后再降谕旨。”

刚刚进入仕途且学究气十足的王懿荣对慈禧、奕訢这两个枢府权要的明争暗斗，对慈禧利用奕訢压制奕訢的政争权术自然是如雾里看花。按照他的性格，就算是看清楚了，他也会枢理直言，把自己认定的想法如实上奏。甲申易枢发生后，当时有一些大臣上奏疏表示“醇亲王不宜参预军务”，王懿荣也不识时务地上了那道要慈禧太后收回成命的奏疏。他的主要理由是醇亲王与皇上是父子关系，“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是纲常伦纪，“以君臣之礼，皇上之于醇亲王所不能施”，不如让醇亲王“颐养闲居，长承天眷”，以维持纲常伦纪。他认为军机大臣同醇亲王会商，违背了纲常伦纪，“拟请皇太后收回成命”，表示自己“束发受书，稍知大义，十年以来，

思之烂熟，谨遵高宗纯皇帝御论隐全大义一旨，为纲常伦纪起见，不揣愚妄，昧死上闻”。尽管开口闭口纲常伦纪显得迂腐，但此事充分体现了他忠贞耿直、直言敢谏的政治品格。这与当时一些见风使舵、投机取巧、趋炎附势之徒，与为升官牟利竞相奔走于奕譞之门的势利小人相比，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慈禧所关心的是怎样才能巩固自己的大权，对这类奏疏是不以为然的。她于三月十八日（4月13日）批旨：“自垂帘以来，揆度时势，不能不用亲藩进参机务。醇亲王与军机会商事件，本为军机处现办紧要事件而言，并非寻常诸事概令与闻，亦断不致另派差事。所奏勿庸议。”王懿荣等人的建言碰了个钉子，面对江河日下、行将就木的清王朝他显然无力回天。取代奕訢的奕譞不像奕訢那样势芒毕露，极力对慈禧实行遏抑，反而为讨好她商尽力顺其意愿，满足她的穷奢极欲，清廷朝政更加腐败了。

同年三月，王懿荣还奏上《请速开马颊，分减黄流，以弭东患，商卫畿辅疏》。河工即黄河水利与漕运、盐政、兵饷并称为清代四大政，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事，向为忧国忧民之士所关注。王懿荣以为君主分忧、为民生着想自任，黄河下游流经的山东又是自己的家乡，因此对黄河下游水患自然是很关注的。他在奏疏里指出，黄河由山东入海始自汉、宋，以前曾在山东以外入海，如畿辅之天津、河间商府在夏周之



际就曾经是九河入海故道。现今黄河从大清河入海，但大清河窄，泥沙淤积，日积日高，导致山东境内黄河连年决口，而京畿一带的地势是东高北低，黄河之水可能北下，“若不设法分减黄流，将来水性就下积渐之势在天津，实可虑也”。天津附近的静海、沧州一带“为历年霖潦积水不涸之区”，如再有黄河水患，灾情将十分严重，不可不设法预防。那么，如何解决黄河下游水患，既保山东平安，又可预防京畿水患，王懿荣注意到，上年山东巡抚张曜奉旨疏通下游，“近日开通徒骇，分设水门，引河入海”。他认为开通徒骇河“自是长策。然徒骇河上游面宽不过三四十丈，且多淤浅，势不如兼用马颊以分其势，为益尤大。马颊河身宽有百致十丈，两岸屹立，大段深通，但使培残补缺，挑深增高，即可畅流入海。两河并用，黄水自然分减”。他表示自己的家乡登州府离黄河远而且地势高，不受黄河水患之害，也不是偏护黄河下游所流经的各州县，更用不着故作保卫畿辅之危词以危言耸听，而是看到“河势日北”，大有欲复九河故道之势，与民命国运息息相关，因此，“既有所见，不敢自安缄默”。此折体现了王懿荣作为一个深受传统文化熏染的士大夫忧国忧民、关心国事民瘼的悲悯情怀。而他对黄河水利这类专业问题的关注与懂行，这与当时的一些清流派徒发高论、空腐无实故形象形成了鲜明的区别。

王懿荣新官上任数月间，任劳任怨，忧国忧民，积极建言，勇于任事，可以说是做到了鞠躬尽瘁、赤胆忠心。他因此而病倒了，眩晕呕吐，病情严重。

光绪十一年（1885），朝廷举办乡试考官的选拔，王懿荣因病未能参加。座师翁同龢、藩祖荫介绍一位名叫潘霨的大夫为他治病。潘霨，字伟如，江苏吴县人，山东巡抚。翁同龢在日记中写道：“早间站班晤盛伯熙，知王莲生病剧。伯熙嘱代请潘伟如。作札延之，复信明日已正到诊。”王懿荣服了潘伟如的药后，疗效甚好，但未能根治，后虽经多方诊疗，也没有恢复。

## （二）齐家与治平兼顾

王懿荣人到中年，不但身体状况不如从前，而且家里的重担也拖累着他，使他付出很多心血和精力。几年中，王懿荣因为丁父忧等家事，不得不把注意力从国事上转移过来。他的父亲王祖源于光绪十二年二月十四日（3月19日）病逝于锡拉胡同京寓。

王祖源，原名伯濂，字濂堂，一字渊慈，号莲塘。于道光二年十月初三日（1822年11月16日）生于山东福山占现村（现划归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道光二十九年，中道光己酉科拔贡。咸丰六年（1856），入京供职兵部主事。咸丰十年，奉旨回籍办

团练。同治十一年（1872），携眷赴任四川龙安府知府。光绪五年（1879），调署四川成都府知府。八年，升任四川成绵龙茂兵备道。光绪九年署四川按察使司按察使。次年调署四川监茶道，任事七个月后，仍回成绵龙茂兵备道原任。光绪十一年（1885），以两届俸满请咨赴部引见。王祖源在四川任职 16 年，非常思念自己的家乡，屡请引退未获批准，此次提出后，四川总督丁宝桢再三挽留，但他决意东归。旅途中适值严冬，年届晚年的王祖源经过长途跋涉，又感风寒，年底抱病入京。入京后病势转重。王懿荣率家人昼夜伺候，衣不解带逾月，但父亲病情不见好转，终于次年春病逝，享年 65 岁。王懿荣十分悲伤，一直到五年后，已释服两年仍难遣哀思，为父亲坟墓前碑石题辞：松山一角，海色苍茫，梦魂千里，风雨泷岗。但由于谢太夫人在堂，需节悲宽慰她老人家。他自己患眩晕呕吐病已有两年，受此打击，更加体弱憔悴。

他父亲病逝当年，王懿荣扶父灵柩将其父归葬于古现两甲坟（又名梁家坡）祖塋并置祭产薄田百亩。谢太夫人暂留居京坡，但她希望回归故里，叶落归根。为奉迎谢太夫人归养故里，二弟在福山县城城北街置造新宅。王懿荣自己则由里返京，侍候谢太夫人居京宅。光绪十四年（1888），福山县坡新宅落成，他又侍奉谢太夫人归养福山。他的母亲谢太夫人于光

绪二十一年正月初六（1895年2月18日）病逝，享年74岁。

在黄夫人去世后，王懿荣一直思念着自己的亡妻。时隔十多年之后，光绪十九年（1893），王懿荣奉旨任河南乡试正考官。在试毕归京途中，他还写下了《过刑台悼黄夫人》：“泉下吾儿应见汝，汝心那识吾心哀。昙花五十二年后，重过刑台旧县来。”当时，他的长子王崇燕也病逝，他同时写有《汴闸秋夜即事有感》：“两行官烛夜帘垂，世业家风仔细思。体格尚知攻轧茁，声情岂可误连雌？伤心病如蓬头日，触目亡儿咯血时。祇有无私堪报国，精神差处万人知。”两悼王诗所表达的哀怀感伤，令人心酸。虽乡试之事繁忙，但他那能忘怀丧妻亡子之痛，不知泉下的黄夫人能否识得自己心中的哀能。黄夫人享年仅37岁，他深以此为憾，把黄夫人比做昙花，37年加上离世后十多年，正值53年，这十多年来，哀恸、怀恋之情一直伴随着自己。光绪八年十一月（1882年12月），王懿荣继娶谢夫人，抵直来良乡县与谢夫人结婚。谢夫人是母舅良乡知县谢伟勋（字方平，山东福山县人，官直隶候补知县）的女儿。她后来与王懿荣一道殉国。

王懿荣有四男一女。其中，长子、次子、长女、次女为元配黄夫人所出。长女四岁时早夭。次女王崇瑛于光绪八年八月（1882年9月）嫁与海丰（今山东



无棣) 吴氏。吴氏一家也是官宦世家，祖父吴式芬(字子芯)，道光十五年(1835)乙未科进士，官至翰林院编修，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父亲吴重喜(字仲怡)，咸丰十一年(1861)辛酉科举人，官到河南巡抚。光绪十七年(1891)，长子王崇燕参加山东省乡试，中第16名举人，但不幸于光绪十九年早逝于京宅，年仅26岁。长子英年早逝，王懿荣深怀悲哀，写下了沉痛的悼亡诗。次子王崇烈于光绪二十年参加顺天府乡试，中第32名举人。王懿荣继娶谢夫人后，生三子、四子、三女，三子、三女均降生不久就夭折，四子王崇焕(字汉章)于光绪十八年三月二十一日(1892年4月17日)出生，父亲殉国时年仅九岁。

在光绪十二年(1886)至光绪十五年年初，王懿荣为父亲守孝，加上身体也不好，又要侍候谢太夫人，照应一家大小，朝廷当差之事相对少了些。他为父亲丧事及谢太夫人归养福山之事，在北京与福山间往返，作为一个上有老下有小的中年人承担起了家里的重担。但他依旧关心国事，光绪十四年奉谢太夫人归养福山后，立即赴省呈报起复，返京供职。次年乞假归葬父亲于两甲坡祖坡，事毕即返京师。

光绪十五年，王懿荣任乙丑恩科乡试的磨勘试卷官。后来他还担任过光绪十八年壬辰科磨勘试卷官。这是乡试、会试对诸考卷进行复核的官员。清代从康熙四十一年(1702)壬午科乡试时开始，对考生的墨

卷（原试卷）、硃卷（为防止阅卷官认出考生笔迹而用硃笔重新复写的卷子）进行复核。同年参加御史考试，钦取第一名，为记名御史，晋升为翰林院试讲，并任庚寅科庶吉士教习。他还担任过光绪十六年庚寅科和光绪二十一年甲午科庶吉士教习。

光绪十九年秋，王懿荣奉旨任河南乡试正考官，副考官是临渝李桂林（字子丹）。发榜后，得时人称道。乡试结束后，他回到北京。虽事务繁忙，但终难忍亡妻丧子之痛，留下了悼黄夫人及忆长子的两首哀怀凄恻的悼亡诗。

光绪二十年，王懿荣已年届半百。年初，他在京察中被列为一等，以道府记名。京察是朝廷对在京任职官员的考核，明朝是六年一次，清朝取为三年一次。按一定标准考核后，按优劣分别予以奖惩。翰林院所属的官员京察列为一等的，可以任知府或道员。接着，他又参加了翰詹大考。皇帝所下上谕中说：“此次考试翰詹各员，经校阅大臣进呈，朕复加披览，亲定等第，一等六员，二等七十七员，三等一百二十三员。”考核翰林的目的，既是通过检查翰林的学问作为其升迁或降黜的依据，同时是为各省乡试选拔考官。在此次大考中，被钦定为一等的六人为：文廷式，以侍读学士升用；秦绶章、陆宝忠，以侍讲学士升用；戴鸿慈、秦兆文，以庶子升用；王懿荣以侍读升用。他们原都为编修。五月七日（6月10日）奉



上谕：翰林院侍读王懿荣著在南书房行走。次日，王懿荣奏上《南书房行走谢恩折》，表达了恭谢天恩之意，表示要“勉竭愚诚”，“懍夙夜勉公之义”，恪尽职守，勇于任事，以报效“朝廷特达之知”。其忠心可嘉，但清王朝在内忧外患冲击下已近覆亡，而整个官场依然昏庸腐败，他显然难以独力支撑大厦之将倾，最后选择以身殉国不是偶然的。五月二十四日（6月27日），朝廷从翰林院选一补署汉日讲起居注官，翰林院向皇帝推荐了王懿荣等三人，并带领引见。光绪皇帝圈出王懿荣。起居注官是内廷侍从皇帝并掌记录皇帝言行的官员。二十六日（6月29日），他奏上谢恩疏。

在这些年中，王懿荣在失去黄夫人后，又连累父丧子亡之恸，并承担了家庭重担，但他不因家事误公事，积极建言与任事，展现了一个忠孝兼顾的正直士大夫形象。

### （三）三任国子监祭酒

光绪二十六年六月十四日（1894年7月16日），王懿荣接到上谕：“陆润庠现出试差，国子监祭酒著王懿荣署理。钦此。”这是他第一次出任祭酒之职。

国子监位于北京安定门内雍和宫对面的成贤街，左边与孔庙相比邻，取左庙右学之意。元明清三代，

国子监是国家最高学府，因遍布于全国各地的府州县各级官学亦归其统领，故而也是国家最高教育管理机构。始建于元世祖忽必烈至元二十四年（1288），距今已有七百余年历史。元代遗址已无从细考，只有古槐、古柏两株古树，相传为首任国子监祭酒许衡亲手所植。明朝明成祖迁都北京后仿南京国子监再建，清代又有增益。国子监之正门叫集贤门，是一黄色琉璃牌楼；牌楼之北有一大名鼎鼎之“辟雍”，乾隆时所建，是核心建筑，为天子讲学之所；后为彝伦堂，是祭酒（相当于校长兼教育部长）和司业（相当于当今之教务长）办公处所，还有“四厅六堂”，四厅为教习（教授、讲师）之办公处，六堂为监生之教室。国子监虽号称最高学府，但在科举时代，其毕业生地位相对教低。若想取得功名，还须参加乡试。唯一的照顾是无论国子监生之籍贯，皆可应试于顺天府（大致相当于今北京布）。若不再考取功名，以国子监生身份入仕，则多被用做县丞（副县长），或教谕、训导等学官，秩低而俸薄，权轻而利小，学生学习积极性不高。监生们除学习四书五经外，尚有历代典礼赋役律令、边防、天官、河渠、算法之类。

王懿荣任祭酒时爆发了中日甲午战争，任职半年中，他一面在南书房行走，一面兼署祭酒，还以忧虑的心情关注着战争的进展。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正月，他奏请回籍办理而获准。正月二十二日（2

月16日)由京起程赴登州府。四月二十三日(5月17日),接到上谕和议已定,停办团练,回京供职。向朝廷请假两月获准,后归里省亲。五月十八日(6月10日)奉上谕:“王懿荣著补授国子监祭酒。钦此。”六月假期已满,十六日(8月6日),由烟台起程北上。二十日(8月10日)回京复命,具疏谢恩,并奏请注销钦命办理山东登州团练木质关防。

王懿荣第二次任国子监祭酒也不过半年时间。在此烟间,光绪帝赏赐御笔“福寿”、“荣庆”各一幅,他与张百熙等具疏谢恩。光绪二十二年正月初六(2月18日),母亲谢太夫人因年事已高,且南北往返,劳累过度,病理于福山城内北街里第。谢太夫人生于道光三年(1823),享年74岁。王懿荣在京接到讣告,星夜匍匐奔丧。到光绪二十四年二月服闋,他携长媳张氏及孙儿福坤回到北京。四月二十一日(6月2日),王懿荣向光绪皇帝请圣安,蒙谕召见,并奉旨仍在南书房行走。次日,具折谢恩。二十三日(6月9日)到任。王懿荣在内廷当值,备受皇帝与两宫太后信任与重用,鉴别书画、恭代御笔、进皇书第等事经常要找他,有时一日要两人宫廷。

光绪二十五年五月二十九日(1899年7月6日),王懿荣奉上谕:补授国子监祭酒。次日,具疏谢恩。至此,他三为祭酒。他在任上朝夕人值,风雨无阻。退值余闲,还要秉烛批改监生的作业、课卷。诸生得

到他的教诲，相互勉励，努力学习，学业大有长进。在这一年里，前国子监祭酒盛昱病逝。原在国子监南学肄业诸生喻长霖等多人呈请，王懿荣代为奏上《请将已故祭酒宣付史馆立传疏》，建议将盛昱宣付史馆，列入儒林传。建道奏折是研究王懿荣生平及思想的重要资料。如关于办学宗旨，北京大学的前身京师大学堂在前此一年创办，京师大学堂的办学指导思想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王懿荣则赞扬盛昱“教士以通经致用为本，根柢程朱，而益之以许郑贾孔之学”，可见他对当时已成为时尚的洋务与而学是抵触的。又如他对戊戌变法的态度也可从此折中略知一二，折中提到“逆犯康有为倡为邪说之时，本学肄业生，皆笃守师传，无一人为其煽诱，亦可见以道得民之效矣”。他指责康有为提倡而学与倡导变法为异端邪说，并以监生远离戊戌变法而自豪。他对自己自幼开始接受的传统价值忠信不疑，最终可说是以生命践行了儒学的道德价值，呈现给我们以饱学守践的文化保守主义者与忠贞耿直的传统士大夫这样一种鲜明的形象。

同年，其弟王懿燊因误服补药而一病不起，于七月十一日（8月16日）病逝于福山，享年49岁。

#### （四）厌倦官场

王懿荣对艰难坎坷的求仕之路与尔虞我诈的官场



生活怀有难以言表的复杂心情。科考与入仕固然使自己光宗耀祖并得以跻身上流社会，但应付那种僵死无用的科考与风云难测的宦游，占去了自己的大好时光，使自己身心憔悴。他也曾屡屡落第，备受左邻右舍的嘲讽与鄙视。后虽高中，但想到自己的巨大付出与黄夫人对题名录的恐怖，他又怎能高兴得起来。如果说中进士点翰林意味着人生的春天来临，然而凄凉秋风的阴影使他并没有感到春光无限的美好。以忠贞耿直、直言敢谏、清廉自守、忧国忧民的传统士大夫形象置身于跻败昏庸的庙堂与勾心斗角的官场，是显得那么不和谐与不趋时。他在多首诗作中道出了自己对官场的厌倦、惆怅与愤懑情绪。

王懿荣因科考与宦游身心劳累，曾经两得重症。一次是在十三年（1874），他生了一场大病，三个月还不好。此时黄夫人还在，她自己也有病，但为侍候自己的丈夫常常日夜不寐，白天抱病奉上汤药，夜静时还焚香为其祈祷，经此心力已悴，更加不支。再一次是在任职以后，工作数日就病倒了，以致没能参加光绪十一年（1885）选拔乡试考官的考差之试。此后虽经多方延医诊治，但终未难复，他在一些临病的诗作中流露出了厌倦、逃避、冷漠之意。《病中寄雪堂和尚》一首中有两句：“近从病里常生悟，自悔闲来不解禅。”《病起即事书视同人并索和诗》中则说：“廿年冷宦意萧然，好古成廉力最坚。”表达了自己无

意于高官厚禄而甘愿全身心致力于金石之学的志向。另有一首《船中静坐有感》写道：“百不如人两鬓华，长安久居若为家。可怜一病成秋境，满耳蝉声满眼花。”

科场高中，似乎未来前程似禄，仕途不可限量。登上“玉堂”，在常人看来应意味着荣华富贵，风风光光。王懿荣中进士回乡省亲时却没有衣锦还乡的美好感受，《即事偶感》第一首中有两句：漫说玉堂天上似，从来高处不胜寒。登上“玉堂”不见得是什么好事，家游的未来不会全是美梦成真，身居高位之后的厌倦与凄凉心境隐隐可期，因为从来都是高处不胜寒。进场后，他的预感得到了应验。这种失望情绪在为官后的诗作中也流露了出来。他在《退值偶感》一首中写道：

心是儿时境已非，此心空逐白云飞。

剧怜襟上三年血，换作五更朝里衣。

儿时怀值对未来的美好憧憬，希望自己能一展抱负，报效祖国并显扬家族，但现实却是官场的恶浊与国势的陵夷，实在是与自己当年的理想相差太远了。儿时的理想既已破灭，只好让心中的美好愿望随白云漂浮而去了。可怜可叹的是，自己一生的心血，换来的是一身皮囊，一身五更上朝时的朝服。



想到自己对仕宦的厌倦，王懿荣真不希望自己的新生儿子再重走自己走过的老路，往事不堪回首，还要从头再来。光绪十八年（1892），王懿荣 48 岁时，第四子王崇焕降生，他写下了《举第四子崇焕》一诗：

京曹岁月太匆匆，二十八年一梦中。  
但愿此儿能长大，半耕半读作村翁。

他告诫自己新生儿子，官场险恶，希望其做个半耕半读的村翁，不要再追逐仕途了。你可能做的是美梦，但一触及现实，会将美好憧憬无情地打破。高处不胜寒，还及做个平民百姓吧，平平淡淡才是真。

还是在这一年，王懿荣的次子王崇燕参加本年壬辰科会试，考完二场、三场，咯血破地，次年病逝，享年仅 26 岁。有多少人为科场仕途付出了心血、才能、青春，甚至献出了生命。王懿荣正是带着这种对仕途的厌倦而匆匆离去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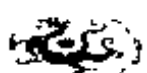
## 四 请缨抗敌

### （一）关心中日危局，积极建言献策

光绪二十二年（1894），是农历甲午年，日本发动了侵略中国的甲午中日战争。六月二十三日（7月25日），日本在牙山口外的丰岛海面，击沉运送清军的面轮“高升”号，全船官兵七百多人死难。同日，日本陆军向驻屯牙山的清军发动攻击，排起了战争。七月一日（8月1日），中日两国宣战，战争正式爆发。战火燃遍朝鲜全境，中国的辽东半岛、山东半岛同时告急，北洋海军又在黄海海战中受到重创。面对危局，时为南书房行走、国子监祭酒的王懿荣忧心如焚，焦灼地关注着战争的进展。他是一介书生，且年届半百，但看到国家多灾多难，忧国忧民之情油然而生，御敌报国之志日益坚定。他多次上书建言，就军情、布兵、用人、筹饷等奏呈皇帝，其情之殷、其心之忠、其意之切，跃然纸上。

九月一日（9月29日）这一天，他连上三折：





《皇太后万寿，吁请暂停点景，但行朝贺疏》，《时势孔亟，请召用亲贤疏》，还有偕同王文锦、吴树梅联名奏上的《请召用恭亲王疏》。

这年的十月初十（11月7日）是慈禧太后六十大寿。尽管战事吃紧，但清廷置民族存亡于不顾，忙于筹备慈禧太后的“万寿庆典”。早在光绪十二年（1886），慈禧就挪用海军经费和其他款项重建被英法联军焚毁的清漪园，并于二年后改名为颐和园。北洋海军在光绪十四年（1888）成军之初，总吨位27400余吨，是日本海军的两倍，中国海军的实力占有明显的优势。由于慈禧花巨资整修颐和园和进行三海工程建设，大大加重了清政府的财政负担，给海军的发展造成严重的后果，北洋海军自成军至甲午战前，未添置一艘新舰。清廷统治者不顾国家安全只顾忙于万寿庆典。为举行庆典，清廷早早就成立了庆典处，专管办理庆典事宜。庆典期间，凡慈禧太后由颐和园皇宫所经过的道路两旁，街道锦面要修葺一新，并分段搭建龙棚、龙楼、经棚、戏台、牌楼、亭座及点设景物。点景工程共分6段，每段需银4万两，60段约需240万两。王懿荣对清廷无银办海防却有钱忙于庆典，尤其是不顾战事吃紧继续操办庆典，很不以为然。他上疏要求“暂停点景但行朝贺”，皇太后庆典不一定非得在国家安危之际操办，可等打完仗以后“随时补行，何时非万寿之时，何日非祝愿之日”。别

人忙着趁庆典之际讨好慈禧，而他却不知趣地要让太后扫兴，直言敢谏，冒死陈词，足见其忧国忧民的忠心与赤胆。此疏递上后，当时朝野为之震惊，许多人都为他捏了一把汗。

在同一天递上的另两道奏折中，王懿荣提出要召用亲贤，主张重新启用恭亲王奕訢，上佐皇帝，下孚众望。恭亲王奕訢自然不可能起到在危机之际力挽狂澜的作用，但两折却体现了王懿荣对时局的忧心与焦虑。此外他强调要用人得当，不满清将“无争胜之意，有相妒之能”，都有合理性。十一月初四日（11月30日），王懿荣奏上《详度夷情审量时局疏》反对轻许议和，主张坚决抗敌，“趁此大兵云集，精厉士兵，厚积军火，肃清海隅，使其畏服，切誓有坚不敢再犯之心”。他相信如果轻言议和，偿付巨额赔款，必然使敌人“挟我之资”而秣厉重来，“是益寇精而资之盗也”，而国家将不得不用财政的一半用于支付赔款，从而有内溃之患。这道奏折，表达了他坚决抗敌的决心。

## （二）请求回籍办理团练以迎击日军

光绪二十年（1894）年底，日本从国内调派一支军队抵达大连湾，与入侵辽东半岛的部分日军汇合成新的军团，以大山岩为司令官，共计2万人，由联合



舰队 25 艘军舰、16 艘鱼雷艇掩护，攻击山东半岛。十二月二十三日、二十四日（1895 年 1 月 18、19 日），日本海军派“吉野”、“秋津洲”、“浪速”三舰，驶到登州（治所在今蓬莱）海岸，对府城进行炮击，并击中了蓬莱阁。十二月二十五日（1 月 20 日），日军攻陷成山和荣成县城，包抄威海卫后路。山东巡抚李秉衡派兵与敌在枫岭、桥头等地交战，威海卫后防诸要塞全部落入敌手。光绪二十一年一月五日（1895 年 1 月 30 日），日军向威卫南邦诸炮台发起进攻，同时联合舰队从海上发起攻击。眼看战火蔓延到自己的家乡，王懿荣愁虑彷徨，眠食俱废。他上疏请求回籍兴办团练以抵御倭寇。他在奏折中指出：自己的老家福山地处滨海，距威海百八十里，是渤海南路要冲，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此地一失，大局瓦裂”。胶东半岛军事防御力量薄弱，虽有山东巡抚李秉衡公忠廉洁，坚持抗敌，但因上任不久，兵力单薄，武器陈旧，“淮军水师倚恃李鸿章，不遵该抚约束”，因而导致了荣成失陷之事。日军侵略山东半岛，使包括自己的 73 岁高龄的老母亲在内的民众十分惶恐，必须稳定人心。自己十六七岁时曾随父亲办理登州海疆一带团练，有一定的经验和旧关系。现在时值国家危乘之际，惟有恳求皇帝准许他回籍“会同抚臣办理团练，兼事招募”。他还指出，眼下军情紧急，刻不容缓，“非有得力军干，迅速赴援，不足济急”。因此建议皇

帝派自己的堂弟、陕西永兴军记名提督王鸿发驰援威海，以解威海之围。他还奏请皇上恩准莱阳籍的翰林院编修王士序，黄县（今龙口）的族兄翰林院检讨王守训，荣威籍的前宿松县知县孙葆田等一起前往院东，协助自己办练团练。

同日，王懿荣的妹夫、两江总督张之洞也向朝廷建议，在“孤军督难久持，援军缓不济急”的情况下，由山东巡抚李秉衡“晓谕荣成、登州一带居民，各集团练义勇，协助官军击倭”。光绪帝采纳了这些建议，令李秉衡催促地方文武赶紧办理，同时允准王懿荣回籍办团练，同时颁发饷银两千两，以作筹备之资。

王懿荣援旨后，于光绪二十一年正月十九日（1895年2月13日）承领所需银两后，于二十二日（2月16日）由京城束装出发，立即赶回原籍。他在回登州途中沿路考察直隶及山东各州县举办团练的情况，并随时向朝廷奏报。经过长途跋涉，抵达莱州府，面见山东巡抚李秉衡。至此他才知道威海已经失陷，北洋海军于正月二十三日（2月17日）他刚离开京师时已全军覆没，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总兵刘步蟾、参将杨用霖等自杀殉国。王懿荣不顾旅途劳累，与李秉衡商谈布防和巡视团练布关事项，在十几天内巡视了登州所属十县团练训练情况。在蓬莱阁北山炮台视察结束后，他亲笔题写了《郛城夏公印辛酉

字庚堂德公牌》，表彰提督夏辛酉率守军向日三舰发炮轰击，使“吉野受此一惊，急旋舰身躲避”的事迹。

王懿荣行经莱阳时，知县徐桂宝对他回郡抗敌的事迹感到钦佩，将自己珍藏的戚继光当年抗倭时所用的宝刀赠给了他。王懿荣从小就敬仰戚继光这位同乡的抗倭名将，童年时即爱读其《练兵宝纪》、《纪效新书》等兵书，光绪十五年（1889）他在翰林院供职时，特将翰林院所藏戚继光的《止止堂集》送交山东巡抚张耀在济南重印，并撰写了《重刻戚继光毅公〈止止堂集〉》。如今又得到戚继光用过的这口宝刀，惊喜之情难以自抑，在给王守训的信中称：“在莱得万历十年戚武毅所造刀，此是刻《止止堂集》之报也。”他写下了《戚武毅公宝刀歌》：

昔年曾刻南塘集，今朝喜得戚家刀。  
刀轻如纸光如水，两行款识秋芒亮。  
上镌万历十年存，是时公居蓟镇地。  
登州戚氏岳家军，铸刀初戚姓为记。  
忆昔浙闽与三边，公所到处皆凌烟。  
虏酒朔风不成醉，精神炯炯三百年。  
几经流传济南驿，徐侯得之若共璧。  
银函未改明时装，鸛鹑血染苔花碧。  
我今持节过莱阳，下马直上徐侯堂。

徐侯宝刀举相赠，知余团练兼御防。  
千金挂树生不疑，楚弓楚得千古奇。  
即今边防无二义，关东诸将何离披？  
北洋舟师列无论，一掷三千六百万。  
遂令穷岛逞天骄，海峡虾夷任滋蔓。  
朝廷命我治乡兵，徐侯与我同岁生。  
俯仰东南天半壁，酒酣斫地泪纵横。

王懿荣奔走各县，积极联络，多方筹措，完全有可能组织起一支强大的民团武装。他感受到了家乡父老同仇敌忾为使“吾郡冢墓不至沦入异域”而不惜死丧的豪情，他认为“人心甚齐，最为可用”。民心可用，这是抗敌御侮、挽救民族危亡的关键与根本。但清廷统治者无视人民的力量，避战逃战，派员乞和，下令李鸿章签署了空前屈辱的《马关条约》。“俯仰东南天半壁，酒酣斫地泪纵横”，王懿荣悲痛欲绝，以刀砍地，恨声连连。民心可用，清廷却弃之不用；宝刀可以杀敌，而今锋芒何向！自己希望指挥民团像先贤那样保家卫国，但看来是报国无门，只能徒叹山河破碎了。此番请缨抗敌虽来能如愿，但他抗敌御侮的决心与豪情依旧未减，随时准备再次赴汤蹈火。



### （三）含恨挥泪告别家乡

王懿荣以一介书生，投笔从戎，冒着寒冷，经长途跋涉回籍办理团练，但壮志未酬。《马关条约》的签订，使其组织民团御敌的愿望落空。光绪二十一年四月二十三日（1895年5月17日），他接到朝廷于十八日寄出的上谕：“和议已定，勿庸招募，立即回京供职。”二十七日（5月21日），他向朝廷请假两个月，回福山省亲。

王懿荣准备回籍办团练时，接到东海观道刘含芸飞函相报，于是年正月初三（1月28日）专轮接他母亲谢太夫人赴南京，到他的妹夫张之洞的两江总督任所，张之洞为其岳母在南京城内花牌楼大街租了房子。他的弟弟王懿荣携长子妇张氏等前往南京，随侍谢太夫人。甲午战争结束后，张之洞派人迎接。他在致张之洞的信中表示，家母在南京居住数月，“往返乘资，坐耗清俸，应不下千金”，这次请假在家，也有时间去南京亲自将母亲接回，“惟限于资斧”，囊中羞涩，又不好意思再让张之洞破费，故只好作罢。

他在信中还提到，此次回籍办理团练，户部省库银2.5万作为团练月饷，丝毫未动，只是作为筹督费用两千两部支银已全部花完，而且还赔上500余两，是向故里乡亲借贷的。山东巡抚李秉衡表示赠给千金

以弥补亏空，但他表示此行是赴“急难”而非“谋差”，加以谢绝了。

谢太夫人到家后，王懿荣将办团练之事向母亲作了禀告，其中提及了缴还户部饷银之事。他提到三个月奏调人员等事，已将部支两千两白银花光，但终不能为国家出力，“不敢累国家以度支也”，打算把两千两饷银缴还户部。谢太夫人对此大为赞赏，并决定质押衣裘，卖掉钗钏，用来弥补亏欠。她说：“吾衣饰岂所固有，皆国恩之余。以国家赐予复为国家用之，何憾！汝勿以累我为念。”王懿荣再拜受命。

谢太夫人、王懿荣母子“毁家纾难”的清廉，与慈禧穷奢极欲乃至挪用军费搞万寿庆典，及不惜出卖国家权益换取苟安的行径，与当时官场上贪污腐败的风气对比，形成了天壤之别。





## 五 文苑名士

### （一）“好古成魔”，多方搜罗文物古器

王懿荣成为收藏鉴定甲骨文的第一人，不是偶然的，这是他性嗜金石、“好古成魔”，长期收藏并鉴识文物因而在金石学方面具有高深造诣的结果。他是金石学中的“伯乐”，正是这种慧眼与学养，成就了他作为甲骨文之父的开拓性业绩。他在《病起即事书示同人并索和诗》一首中写道：“廿年冷宦慧萧然，好古成魔力是坚。”“墨癖书淫是吾病，旁人休笑余魔癫。”他的志趣与真爱并不在仕途，而是在收藏和研究金石文物，古籍字画。他从骨子里就不是一个官僚政客，而是一个文人名士。

受家学影响，王懿荣从青少年时代，就对金石古物抱有浓厚的兴趣，具有深厚的学术积累、丰富的鉴定经验。在成为进士之前，他就已名满京都，士子争相结交以为风雅。同治八年（1869），题《登州古物拓本》，将福山出土文物尽数收入。后编县志时，金

石门即据此为蓝本。他酷爱旧槧本书、古彝器、碑版、古籍等文物，在京任职期间，下班后常到市场寻求，时有所见。如有所得，不惜重金求购，有时竟至于典卖妻子家人的首饰物品。他的举动得到了黄夫人的支持。他回忆，自己转完市场后看到有什么值得收藏的东西，回家后就与黄夫人谈起，黄夫人总是鼓励他买回来。她说：“明珠白璧，异日有力时，皆可立致之，惟此等物事往往如昙花一现，撒手便夫，移时不可复得，后来纵有奇遇，未必即此类中之此种也。”有时为了购得文物，黄夫人将自己的裘葛、钗凤拿去典质。对自己所购得的彝器、古钱、印、镜、剑、砖瓦等物，每得一种，黄夫人必亲于镜拓，务使纸白如玉，墨光如籍，做到尽善尽类方罢。每到盛夏，她总要将内室所藏书画、碑帖、墨本等物，拿到阳光下晾晒，以防蠹虫和老鼠。那时儿女还小，但由于母亲的教育，都不敢接近家中所藏文物。

光绪六年（1880），王懿荣中进士后归里省亲之际，也是沿途收集文物，寻访旧迹，此行收获不少。先是来到临近山东的直隶盐山县王墅镜，得到一块天保造像残石。天保是南北朝时期的北齐文宣帝高洋的年号（550—559），距今已一千三百多年。经过沧州五龙堂，看到有一造像卧地，有字无年月，他判断是唐朝时刻的。年底抵达家乡后，首先得到的是宋拓《文清楼书谱》，僧达受六舟藏本，得自福山世家鹿泽

长的家中。鹿泽长，字春如，嘉庆癸酉科拔贡，曾在陕西、江西、浙江等地为官，官至宁绍台道。后家道中落，藏书不少，旧藏不知沦落何方。又得到六臣注本《文选》、明刻本《苏文忠公全集》等。腊月二十三祭过灶后，王懿荣冒着大雪到登州府城蓬莱住了两天。这是他生平第一次到蓬莱，没有来得及登临蓬莱阁，而是急着去蓬莱县收藏家张允勳所藏境内东边郭村所出土的文物，有汉琴亭侯国刻石、书画、砖瓦等，多而且精，“不及细数”，可惜却无一本旧书。在古现村中度岁期间，他到亲友家逐门叩贺，也看到了不少大物。其字画双款，出自康、雍、乾三精时老辈之手。灶上的香炉，是明宪宗成化年间的五彩景泰蓝及神宗万历年间的青花瓷，可惜都破乱了。族中人一起饮宴，所用杯盏是由各家凑在一族的，多是雍正、乾隆年间官宦所产的瓷器，还有明朝的细瓷。亲属中还有人把盛刀创药的料壶隆给他，虽不值钱，但其中有“胡轩”、“新雅轩”的精品。新年到外祖父家去拜年，见到有一瓦研12字的残瓦，“不以见赠”，觉得很遗憾。又看到先从祖姑王侯侯及从祖姑丈郝懿行所辑宋、元、明本的史书及康本《廿四史》。内多明监本，皆一一挖圈贴补得十分精致，逐卷又有校签贴在上而。新年期间，王懿荣还到烟台住了两天，得到明拓《孔庙碑文》，并买到汉朝官印、私印各一方。在县城花两千元买到张刻《玉篇广均》一函，是先从祖

王余莒（乾隆五十四年己酉科解元）遗物。在先尚书府（王鹭府）得到他任闽浙总督时官封二，告示一。还有亲戚送给他纯墨色玉块一枚，油柏村出土的小节墨刀一枚和齐刀五枚，还得到了益都小汪家村出土的一枚完整的齐刀范。新年过后，王懿荣取道北上返京。在黄县，看到了族兄王守训盖新楼时挖得的隋炀帝大业年间长乐乡一古器，“非土、非石，类白泥炀戚佛家楼盖顶间物”。在王穆庵家中看到许多古砖、古印及“彝斋齐”三字的刀币，还得到一枚见赠的六字刀及很多古砖。在潍县他又住了四天，其中三天住在著名金石学家陈介祺家中，看到了陈家收藏的文物古器不计其数，有朱子注《楚辞》、北宋文同（字与可）所画大竹等珍品。这一次归里省亲，收获的确不少，所得钱范、砖瓦难以悉数，还有汉印、齐刀历、古版书刊等，此外还看到了家乡收藏家的许多珍藏品。他觉得十分高兴，在《天壤阁杂记》中如数家珍地记述了往返路途及居家时的所见所闻及所收藏大物的情况。

光绪四年（1878），王懿荣请假赴蜀省亲，一路往返又搜集了不少文物。车行陕西，他从一苏姓古董商手中买到一隋文帝开皇年间（581—600）的铜牌，因价格高，只好“赎得之”。在西安城隍庙，买到明初刻印的《元史》残本，缺数十卷，书上盖有明初英国公的印及四名范氏的印章。得到元刻本《古今均



会》，缺三卷，自己原有一步完整的明刻本，此本又多前面一序言，是其他版所没有的。他后来返京时在同一书肆购得宋朝南雍大字明印本《魏书》、《北齐书》、《北周书》，连同他原有的明库册纸元本《隋书》、元本《北史》、明朝翻印的宋秘阁本大字《晋书》、元大德本涂改称宋乾道本的《汉书》，慨然有集旧本全史之志。在长安购得缺铸大钱 50 枚及钱范一、造像二。到四川后，弟弟王懿弟为他买到了元本《宋相臣传》。在四川做官的同族宗亲王朝赠给他“王渔洋诗稿”一件、《池北偶谈》原稿十多页。他又以重金购得山东同乡、一位姓周的幕僚枚集的古泉、古印，又从一廖姓古董商手中买到一枚生砂活翠、文字精美的东周古钱。他还以邮购的方式从古董面中买古玩，他记道：“两估寄来牙印二，帛铅印一，涅金二，中布、弟布一。十布尚未金，计缺序布。”布与泉均指古币，十布是王莽篡位后所铸。他一心想把十布枚集齐金，此次由川返京途经陕商时终于从孙姓古董南手中买到了序布，使其蓄志 20 年的夙愿得以实现。

王懿荣是于光绪五年（1879）由四川北上，回京应试的。虽有应乡试之事，未免行色匆匆，但一路上仍不忘使求大物。在长安，从古董商杨实雍手中买到古彝器，其中有一稿形者尤佳，另有方鼎一、小鼎一、觚一。又从一位被称为小苏的古董面中买到一把古剑，王懿荣认为“当为天下集一”，鸟形的阳篆，

如花、如字，字下又有花，锋如新。在河南买到玉含蝉一、汉印二。过龙门时，他看到山崖上那些石凿的佛像，多至亿万身，文字累累，过去所见的拓本与此相比不过万分之一，可惜只能望洋兴叹，“安得挟之以来？”王懿荣一路途经的河陕至汉中一路，出土文物很多，他是流连忘返，一往情深。他真想把所有自己酷爱的文物尽数购回，但有一些文物，却无法购置，只能望而兴叹。因为此行行色匆匆，不及物色，且囊中羞涩，有的文物贵重自己买不起，有的无法带至京城。这一路往返可说是有收获，但也有遗憾。

光绪十九年（1893），王懿荣奉旨到河南当考官，在那里他见到一块辗转运到开封的《刘怀民墓志》，这块墓志从书写格式看，先铭后序，别具一格，王懿荣很是喜欢，便出重金购下。清季方若的《校碑随笔》记载这件事称：王懿荣“以千金易石”。由于王懿荣酷爱古代文物典籍，凡有价值的残石、碑帖、书画、古钱、善本图书等，都设法购置收藏。购置文物耗费了他不少钱财，使他这位“显贵”过看窘迫的生活，有时为了收购文物不得不典当妻子的嫁奁、首饰。他在一首诗中描写自己的窘况：“典衣还惹群书债，折券时蒙小贾羞。如此壮年如此过，争令二老见穷愁。”可见，王懿荣对金石收藏的爱好，是何等的沉醉痴迷。

## （二）撰写多种金石学著作， 呼吁加强文物保护

王懿荣不仅嗜于收藏，而且精于考订。他对各种出土、传世的文物古器就其名称、类别、型式、纹样、文字、书体、功用等特征进行考证，判断年代，鉴别真伪，撰写了一批金石学著作。

其用力最勤、成就最大的金石学著作为《汉石存目》及《南北朝存石目》。光绪七年（1881）春，撰成《南北朝存石目》。此书从同治元年（1862）开始着手，到光绪七年（1881）成书，前后用了19年时间，其间为此书提供帮助的名流、学者有匡源、潘祖荫、缪荃孙等17人。此书收录范围自南北朝至隋代，分碑、志、记、梵典四类，据拓本按年月日著录，无年月日者按类附后。全书目录，有八项：

目一 宋碑记

目二 齐记

目三 梁碑、志、记

目四 陈碑、记

目五 魏、西魏、东魏碑、志、记、梵典

目六 齐碑、志、记、梵典

目七 周碑、志、记、梵典

## 目八 隋碑、志、记、梵典

此书在《山东通志·艺文志》中著录名为《六朝石刻存目》。但仅存稿本，未能刊行。

光绪十五年（1889），《汉石存目》刊行，分上、下二卷。王懿荣自识：近世所存汉石已尽于此。此目石亡文存者不录，重摹伪造者不收，分字存、画存两目。上卷为《字存》，著录包括刻石、阙、碑、记、碣、铭、颂、墓表等各种体裁的汉石铭刻。上面以大字列其名目，下面以小字分别注明书法类别、字存年代、存放地点及扼要的考证文字。下卷为《画存》，著录各种形式、体裁的画像石，有阙画像、堂画像、室画像、祠画像、城垣画像、摩崖画像等多种。这些画像石，有的一面有画像，有的两面有画像，有的三面甚至面面都有画像。著录形式与字存相同。《汉石存目》光绪十五年刊本还附有《周秦魏晋石存目》，是尹彭寿所魏。

上述《汉石存目》与《南北朝存石目》两书是体例完善、收录详尽、科学准确的存石目录，是石刻目录中的经典之作。

除了上述两书，王懿荣的其他金石学方面的著述还有：

《天壤阁杂记》。此书记录了王懿荣于光绪六年（1880）中进士后回故里及赴川省亲往返途中，在山





东、陕西、河南、四川等地搜寻文物的情况，记载了不少自己或他人收藏的绝世珍品。

《求阙文斋文存》。文存中除了一篇《诰封宜人元配蓬莱黄宜人行状》，其余均为学术性文章。其中收录了《说郢钟》等五篇考释金文及古文字的文章。文存中还有《齐鲁古印摺序》、《登州古器物拓木跋》等，也与金石学有关。

《福山金石志残稿》。同治八年（1869），题《登州古器物拓木》，福山出土文物，尽数编入。以后编《福山县志》之金石志即以此为藏本。光绪十七年（1891），福山知县康鸿逵聘请王懿荣等四位福山籍京官，拟重修县志。但由于这四人公务繁忙且经费短缺，只有王懿荣写成了《金石志》等。《福山金石志残稿》起自周朝迄于元朝，后附《光绪二十三年福山修志局来访石目》。王懿荣把金石名称、出土地点加以著录，原石久佚或原石存而文字漫漶者，则将原石文字全部记录下来，原石存而文字模糊不清的则求得原拓本，也将文字全记录下来。后来于宗潼主纂的《福山县志稿》之《金石志》，就是根据《福山金石志残稿》增益而成的。

《王廉生古泉精选拓本》。王懿荣所藏不乏古钱，如“东周”古钱、王莽“十布”等，其康编为是书。

其他还有《攀古楼藏器释文》等。其青铜器方面的藏品有的编入《日光室藏器目》。所收藏的陶文归

其弟子刘鹗所有，编入《铁云藏陶》，另有 33 方见于《黄平乐氏藏陶拓本》。所藏玺印，身后由其子王崇烈编辑《福山王氏劫余印存》一册。所藏瓦文选辑拓印成《天壤阁瓦文》一函四册。

王懿荣收藏、考释文物，尽管他投入了不少心血与财力，但个人的作用毕竟是有限的。要使全国范围的文物得到完善的保护，还需要更多的有识之士共同来保护文物。他在呼唤文物保护意识方面也做出了自己的努力。光绪二十四年（1898），王懿荣为母守丧服闋，在返京途中，路过青州府的益都、临淄两县时，亲眼看到世传的齐桓公、景公及齐四王的古坟大土丘，有农民在上面耕种，惨不忍睹。到济南后，山东巡抚张曜又跟他说，自从黄河改道后，常发生水灾，许多古墓被冲毁。由此他联想到全国各地古墓受人为与自然毁损，许多贵重文物往往来自古墓，因而深感痛惜。于是在次年奏上《请重申旧章封禁天下古墓疏》，疏中首先援引了《钦定大清会典·事例》所编雍正七年谕、乾隆十一年谕、《会典》中的“防护祠墓事例”、《大清律例》“礼律”所载历代帝王陵寝专条及“刑律”所编发冢专条，重申了旧章保护古墓之意。接着，他列举了山东、河南、陕西、奉天等古墓受损的情况：山东省齐王墓铁农耕破坏；奉天省怀仁县高句丽女子文王墓被雨水冲击石穴暴露；云南曲靖晋建宁太守郁宝子墓及陆凉县境内宋宁州刺史郁龙



颜墓被毁；尤其是在陕西省，所属地方古墓众多，有的地方群起盗墓，“争取古物，持以售钱”；等。这种状况令人担忧。有鉴于此，他请求朝廷指令各级官吏“各于所属地方勤加巡视”，对古墓严加保护，对盗墓者严行治罪。王懿荣保护文物的一番苦心，可以理解，所提建议也切实可行，但当时摇摇欲坠的清王朝却不可能顾及这种传承文明的大事。

### （三）关注文教事业，提请续修四库全书

王懿荣作为一个文化名人，对文教事业自然更为关心。在他的奏疏中，除了上述保护古墓一疏外，涉及文教的还有一些，提出了续修四库等其他建议。这些奏疏及所提建议有：

光绪十年二月八日（1884年3月5日），王懿荣递上的《请复古本〈尚书〉附人〈十三经注疏〉与今本〈尚书〉并行疏》。在这一奏疏中，他建议光请帝效法乾隆帝钦定二十四史时以《旧唐书》、《旧五代史》附人使与《新唐书》、《新五代史》并行之意，将古本《尚书》刊于十三经内，使与今本《尚书》并行，还建议“凡请大小考试，命题至《尚书》一经，准其两本并用”。

光绪十五年六月十六日（1889年7月13日），王懿荣奏上《恳恩特饬续修四库全书疏》、《清训饬衍圣

公向学并饬整理衍圣公府地产疏》及《肱陈本朝儒臣所撰〈十三经疏义〉列学宫疏》。这三道奏疏都与文教有关。第一道奏疏中提出：乾隆帝钦定《四库全书》，分经、史、子、集，所收书籍，上自周、秦以迄前清共三千多年，圣作明述灿然大备，汉唐以来文章美富未有如此之盛者。但自《四库全书》修成又已过了二百余年，时经百载，开通日广，文物日新，各种体裁的书籍层出不穷，到了重新聚集到一起的时候了。尤其是近三十年来，学术变化很大，“新学异说纷然竞起”，见异者视古学为迂，务外者以中华为陋，“若不及今整齐百氏，一其指归，其为流弊，岂可信言”。因此，他请求光绪帝降旨重开四库全书馆，续纂前书。续修四库全书的建议体现了王懿荣对传承文明、保存国学的关注，但在当时清王朝处在风雨飘摇的情况下，是不可能顾及这种文化盛举的。令人高兴的是，在王懿荣去世百年后的今天，这种盛世大典得以问世，可以告慰这位近代文化名人的在天之灵了。

所是将本朝儒臣所撰十三经义列学宫这一奏疏，与前述奏请将古本《尚书》附于《十三经注疏》之宗旨是相同的。只是前一折所奏请的是《尚书》一书，而这次奏请的是有关整个十三经的疏义之作。他所推荐的清朝治经名著有李道平所撰《周易集解纂疏》，孙星衍所撰《尚书今古文注疏》，陈奂所撰《毛诗传疏》，陈立所撰《公羊义疏》，刘宝楠所撰《论语正



义》，郝懿行所撰《尔雅义疏》，焦循所撰《孟子正义》等，建议将这些著作详细校勘，刊刻成函，汇送国子监，印刷刊布，颁行直省各学，嘉与士林。此举对整理与弘扬清代经学学术成果会有裨益，但反映了王懿荣面对当时中西学冲突的取舍，他视新学为“异说”，而建议将十三经疏义列学官，与当时洋务派所扬出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相比还要保守。因此，当时就有人对王懿荣的这一建议不以为然。户科给事中洪良品上疏弹劾王懿荣“专己守残”，认为续修四库全书尚属可行，而儒臣经义请列学官毋建置议。

王懿荣在同一天所上的另一奏疏中指出：孔子是至圣先师，以一身立人伦之极，为万世师表。孔子后裔“当存圣贤之心，行圣贤之事，一切秉礼守义，以骄奢为戒”。但传至 75 代衍圣公孔祥珂，“幼而多病，中年短折，外成任事，家用不康，折毁墙屋，遭罹火灾，书籍面录，散亡殆尽。加以恩赐田产，百户把持任意出纳，儒蔽日深，渐多失迷。尼山、洙泗两书院，久已废弛，门庭荒芜，家计零落”，甚至子其“田产租粮，经管侵吞，朦混多弊，积重难返，非官为清理，不足以定出入”。他建议朝廷下旨要山东巡抚重礼延请一经明行修之士“严课”76 代衍圣公“孔令貽认真读书”，另选择一位妥实的道府大员前往曲阜，全国地方官员清查衍圣公府地亩，稽核粮租，

确定章程，择人管理。王懿荣希望圣人后裔能恪守圣道，为万世师表，并通过清查孔府田产维护圣人后裔的尊严，以加强清廷的思想统治。

王懿荣的上述奏疏上呈后，光绪帝曾下旨山东巡抚派员核查。但光绪十七年（1891）山东巡抚张曜病故，后任巡抚福润一直未及清理。光绪二十年十一月四日（11月30日），他又奏上《重申前请整理孔子祀田并清查地产疏》。在这一奏疏中，他根据嘉庆朝《钦定大清会典·事例》、《阙里文献考》等文献，详述了衍圣公府地户情况。接着再次要求朝廷派员清查衍圣公府地产，坚决查清隐占偷卖、报根升科者。此次上疏还附夹片，奏请修复尼山、洙泗两书院，指出在书院修建过程中有偷工减料、吞占款项之传闻，要求确切查明。又附夹片：因衍圣公府不戒于火，近几年来旧藏书籍焚毁一空，请求朝廷下旨各省督抚，无论新旧刻本图书，各送一份交山东巡抚，转行曲阜收藏。各省官绅家刻经籍，愿送曲阜衍圣公府的，也听其就近呈交该省官长，咨送山东巡抚，汇交孔令貽收存。

这些奏疏表明王懿荣希望维护圣人与儒家经典的权威，其思想倾向无疑是保守的，但我们也不难看到他嫉恶如仇、清正廉明及忠于朝廷、恪尽职守的一片丹心。他不能容忍吏治腐败到衍公府的田产照样侵吞、修葺孔府书院款项照样贪污这种程度。因此他一



再上书要求清查衍圣公府地产。只是清政府的腐败那时已不可救药，仁人志士只能是徒叹无可奈何花落去了。

## 六 甲骨之父

### （一）发现与确定甲骨文的第一人

王懿荣在中国文化史上的显赫名声，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是甲骨文之父，是中国第一个发现和审定甲骨文的人。王崇焕所编《王文敏公年谱》记载，光绪二十五年（1899）秋天，一位古董商人携带从河南彰德府安阳县小商屯发现的“龙骨”到京师，让其观看，王懿荣细为考订，审定为殷商故物，并发现其上有篆籀之前的古文字，遂令悉载购归，获千数片。这便是后来让世人震惊的甲骨文的发现。

甲骨文是刻在龟甲和兽骨的一种文字。当这些龟甲和兽骨上的文字未被认出以前，它们只是被当做一味叫“龙骨”的药材，卖进药店，然后被携成药渣，喝进病人的肚子里。据传，最先把甲骨当药材进进药编的，是一个叫李成的小屯村剃头匠。他在染疾后无钱买药的情况下，无奈中捡拾甲骨磨成粉末来治身上购脓疮，发现疮商脓水被骨粉吸干而决意进一步试验





其疗效。甲骨可以吸湿，一试果然见奇效。于是他不再以理发为业，而专事收集“龙骨”，药铺掌柜以六文钱一斤收购。李成还自己在庙会上摆起了摊子，叫卖刀枪跌打药。他是把“龙骨”研成了细粉，包成小包，以跌打药往外卖。小屯村的村民也跟着去捡拾“龙骨”去换钱了。

据一个署名“汐翁”的人发表《龟甲文》一文讲，光绪二十五年（1899）秋天，王懿荣得了疟疾，用了许多药都不见轻。后老中医给他开了一剂药方，药方上有一味叫“龙骨”的中药。他按医生的诊断及所开药方，派人到宣武门外菜市口一家老中药店达仁堂购药。王懿荣打开药包，想看看“龙骨”的究竟，发现已被捣碎了。于是他又让人从药店里买回了没被捣碎的“龙骨”，发现上面有很多划痕。他猜测这种类似篆文而又不认得的划痕是上古之人留下的文字，于是买下药店的全部“龙骨”，加以细心研究。这些刻有划痕的甲骨是商人占卜用的。骨上的裂纹不是意外所致，而是以高热造成的，商朝人认为裂纹的形状和位置可以预示吉凶。而人事无大小，均以占卜取决。身兼司祭官的占卜者将所选龟甲和兽骨擦净，以尖器在甲骨表面刻上拟问的事，如现存的一块骨上就有这样的问题：“大王问本月初十是否竟出猎。”被着占卜着于所问字句之旁，刻上一道沟纹，再用烧热的铜尖细刺，而致骨面出现裂纹。占卜者研究裂纹，得

知统管有关事务的鬼神之谕，便将答案刻出。因此，裂纹四周的文字，既记载所占之卜辞，也录下卜骨的答案。

传说与年谱所载有些区别，传说是王懿荣因病购药而得甲骨文，而年谱只说是从商人手中购得。不过，这不重要，重要的是甲骨文上的古文字首先被王懿荣确认了。这样，“龙骨”从不值钱的药材一变而为珍贵的古文化研究资料，避免了这一文物的人为毁灭。人们可能会为“龙骨”被破译前到底有多少宝贝喝进糊涂病人的肚子里遗憾，但如果没有独具慧眼的王懿荣，则将是一场不可弥补的、毁灭性的灾难。

王懿荣收藏甲骨的经过大体是这样的：

第一次，光绪二十五年（1899）秋，山东潍县古董商人范维卿（字寿轩）以甲骨 12 片售予王懿荣，每片价银二两（一说四两）。这位姓范的古董商听说豫北安阳一带常有占物出土，因此有时就到这里收购古董，当地农民把发现的“龙骨”拿到他住的客栈，他以很便宜的价格买下。后他把“龙骨”带到京师，卖给王懿荣，王懿荣发现了龟甲上的文字。王懿荣对所收藏的龟甲加以秘藏，不轻以示人，在他生前似未有人看见其甲骨。王氏还命古董商“秘其事”，因此，小屯村人得骨“均以售范，范亦仅售与王文敏公，他人无人知者”。王懿荣另交给范 600 两银子，让范全部收购出土甲骨。

第二次，光绪二十六年（1900）春，范维卿带来100多片刻有文字的甲骨卖给王懿荣。是年秋，范维卿又带了甲骨800多片，高价售于王氏，约得200金；其中据说有一片是全甲，刻了52字。关于这位范姓古董商（学界介绍他的字号有维卿、寿轩、守轩、春清等），山东潍县志稿人物艺术本转载：范春清，一字守轩，范家庄（今潍坊市潍城区符山镇范家村）人。好贩鬻古器，与弟怀清游彰德小屯，得商爵一。次年复往，屯人出龟甲相示，春清以镇数千购四十片，去京师，谒王文敏懿荣，见之惊喜不置，曰：“君等真神人也，何处得此？”以厚值偿之。春清家小康，有田四十余亩，以好购古器，荡其产。鬻荣及刘鹗、端方诸公，皆器重之，而甲骨文始显于世。

第三次，光康二十六年，在范维卿向王懿荣售出甲骨后，不久有潍县的另一古董商赵执斋也携甲骨数百片来京，被王懿荣认卿，值百余金。还有潍县古董商王缉曾于是年将100余片甲骨卖给王懿荣，等。这样在不长的时间里，王懿荣收购了甲骨约1500多片。

王懿荣对所搜集到的甲骨进行研究，很快确认甲骨是贩商之物，确认甲骨上所刻的文字是早于篆稿之前的文字，也就是说早于周朝青铜器上的文字。但作为金石学来的王懿荣于光绪二十五年（1899）认识了甲骨文并加以收藏后，尚未进行深入的研究及留下著述，使千次年八国联军人侵时殉难。王懿荣殉国后，

王家为了还债，把他所收藏的甲骨，大部分转让给了刘鹗。王氏所购藏的甲骨流散和其分散著录的情形大致如下：（1）归于刘鹗者 1000 余片，光绪二十八年（1902）由其次子王崇烈售出。著录于刘鹗所著《铁云藏龟》。（2）赠送天津新学书院 25 片，大多散是带骨臼的牛胛骨，只有一片甲的上端。后著录于《甲骨卜辞七集》。（3）王氏家中保留未出售部分，其数不详。唐兰据王崇烈拓本所印行的《天壤阁甲骨文存》一书共 108 片，但其中有 14 片已著录于他书，因此有一部分是售于刘氏的。另王据王福重（王懿荣孙女）1987 年为《福山区志》所撰《王崇焕传》手稿中写道：1942 年在先母（沈蕴芬）弥留之际嘱我妹妹，生活再苦，也不能将此售出糊口，必须留给二胞兄（王福埏），以继承先人遗志。后来二胞兄在抗日胜利后，直接由成都去美国纽约，在资源委员会驻纽约办事处任职，因此一直保存在我手中。60 年代初，从历史博物馆展览中看到国家器重甲骨，当时我反复考虑先祖遗志与先母遗命，以将甲骨上缴给国家为最佳方案，一方面不致于流失，另一方面会有更多的专家学者研究它，使先祖未完成的使命得以完成，对于殷商时代历史文物会有更多的发现。于是将剩下的 500 余块甲骨上缴到天津市文化局，获得天津市文化局的表彰与奖励。1985 年二胞兄回国探亲时，对此事深表赞同，认为只有这样处蕴才能更好继承先祖遗



志。(4) 归于美国传教士福开森者 31 片。后著录于《福氏所藏甲骨文字》。编者商承祚认为这 31 片是刘鹗故物，但唐兰在《天福阁甲骨文存》序中认定为是王氏所藏。另王氏三孙女王福重曾以两片赠方豪。

## (二) 关于甲骨文最先发现者与最早发现时间的争论

甲骨文发现已经一百多年了。关于甲骨文的最先发现者与最早发现时间，主要有两种说法：第一种说法是光緒二十五年（1899）为王懿荣最早发现、考订、购藏，这是百多年来绝大多数人的意见；第二种说法是光緒二十四年，王森、孟定生为最早发现者，这是少数人的主张。

第一种说法，在甲骨发现百多年以来可以是定论，很长时间内学界也无异说。我国第一个著录甲骨文的刘鹗，他于光緒二十九年在其著录的《铁云藏龟》自序中说：“己亥岁（1899）出土于河南汤阴（实为安阳）县属之古羑里城……福山王大敏公见之狂喜，以厚值留之。”罗振玉在为《铁云藏龟》所作的序中称：“至光緒己亥（光緒二十五年，1899）而古龟古骨乃出焉。”七年之后，即宣統二年（1910），他在《殷商贞卜文字考》自序中说：“光緒己亥，予闻河南汤阴（安阳）发现古龟甲兽骨，其上皆有刻

辞，为福山王文敏公所得，恨不得遽见也。”这段话既表明王懿荣于光绪二十五年购藏甲骨文的情况，也表达自己急于见到王氏这批收藏的迫切心情。他后来在《殷墟书契前编》、《殷墟书契后编》等论著中又多次提及，甲骨文发现是在光绪二十五年，而王懿荣是首得者。即使他说过甲骨出自庚子（1900），是因为王氏大批购得是在这一年，而上一年只买了12块。1917年，王国维在《戡寿堂所藏殷墟文字》序中再次提到：光编戊戌、己亥（1898、1899），当绪人得龟甲牛骨，古董商带到京师，“为福山王文敏公懿荣所得”。1920年，他又在《隋庵殷墟文字殷》中又明编地说：“甲骨文出土于安阳小屯，福山王文敏公首得之。”可见，刘鹗、罗振玉、王国维等早期研究甲骨文的大师，他们都是王懿荣的同时代人，都认为王懿荣是最先发现并收藏甲骨文的，并认为最早些时候已见到少量甲骨，但光绪己亥（1899）为出甲骨之年。也许正是根据这几位前辈的结论，王懿荣四子王崇焕在1920年为其父编著的《清王文敏公懿荣年谱》中认定：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秋，王懿荣审定甲骨为殷商故物，是为吾国研究殷墟甲骨文字之始。

不过，王懿荣、刘鹗、罗振玉等均没有准确地确认甲骨文出土的确切地点，或者说是殷墟的所在。王懿荣说河南汤阴、安阳，不甚具体；刘鹗认为是出土于“河南汤阴县属之编里城”；罗振玉说是“闻河南



汤阴发现古龟甲兽骨”，他还相信过甲骨出土于河南卫辉县（今河南汲县）；王崇焕则将小屯村误作“小商屯”。之所以出现这种错误，是因学者们上了古董商们的当，古董商在者到甲骨的文物价值后为防止别人染指而故意隐瞒甲骨文真实的出土地点。

此后，关心、研究甲骨文的多数学者仍然相信王懿荣是确认甲骨文并认定它为商代文字的第一人，也是大量收集、珍藏甲骨文的第一人。如郭沫若于1929年在其《卜辞出土之历史》序文中说：“（甲骨）这件至可珍贵的大物的发现，完全是出于偶然；在其前或已屡有发现而不为人所注意了，注意到的是山东潍县一位姓范的古董商人。……这位商人以为奇货，便运往北京。起初似亦不甚引起注意，后来为当时的显贵福山王懿荣所购买。”郭沫若先生所言之意为，在王懿荣以前，龟甲已被发现。罗振玉在1912年所撰《恒洛访古游记》收录其弟罗振常当年到小屯村调查的一份记录说：“此地埋藏龟骨，前三十余年已发现，不自今日也。”也就是说小屯村农民早在光绪二十五年（1899）前就发现了甲骨。但甲骨为人注意，尤其是注意到它的文物价值而不是药用价值，那是从王懿荣开始的。

再如胡厚宣先生，也是著名考古学家，参加殷墟甲骨收藏甲骨文研究卓有成就者，国际学坛誉其为“甲骨学研究第一人”，他也是一再声言王懿荣是甲骨

文的首先发现者。他曾于 1944 在《甲骨文发现之历史及材料之统计》（收入《甲骨学商史论丛》）一文中提出与王懿荣“同时搜求甲骨者，尚有王襄及孟定生，此事前人多未知”，对王襄、孟定生在甲骨学史上的地位给予了公正的评价。但他从未曾怀疑而是向来明确地认为王懿荣是甲骨文的首先发现者。1952 年，他在《五十年甲骨学论著目》（中华书局 1952 年出版）一书自序中说：“1899 年，也就是清光绪二十五年，王懿荣在北京，因为害怕疟疾吃药才发现了那药中‘龙骨’上所刻，乃是古代的文字。从此以后，慢慢地才有了所谓甲骨之学。”“王懿荣是第一个认识甲骨文字的人”。1987 年，他在《释王懿荣早期所获半龟襄甲卜辞》一文中说：“河南安阳襄墟甲骨文字被认识，是在 1899 年。早期搜集研究甲骨的学者，像刘鹗、罗振玉、王国维及亲往小屯搜集并向范估探问的中外学人，像罗振常、明义士等，都认为王懿荣（1845—1900）是开始认识并最早搜集甲骨的第一人。”1990 年，他为王懿荣纪念馆题词：“庆祝九十多年以来甲骨科学研究的辉煌成就，深切怀念开山的祖师王懿荣先生。”1997 年他在《再论甲骨文发现问题》（作为附录收入吕伟达主编的《王懿荣集》）一文中，在详期论证的基础上再次提出：“在甲骨学发现近百年的今天，我们仍可以说：殷墟甲骨文是在一八九九年，也就是清光绪二十五年己亥，由山东福山





人，名叫王懿荣的，首先认识并加以搜购的。”他还针对自己曾为王襄、孟定生说话，指出：“乃近年忽然由于对王襄文章的曲解，把王懿荣首先认识和搜集甲骨文的学说想予以推翻，另外以为孟定生、王襄提出首先认识和搜集甲骨文字之人。这事倒出乎我早年为孟、王鸣不平的意料之外，真所谓矫枉过正了，使我不能不为此再进一言。”

胡厚宣先生提到早年搜集、研究甲骨文的中外人士均认为“王懿荣是开始认识并最早搜集甲骨文的第一人”。前面所举的是中国学者，我们不妨再看一下早期搜购甲骨的外国学人的著法。加拿大传教士明义士在1933年出版的《甲骨研究》（齐鲁书社1996年重印）一书序中说：“一八九九年，有学看王懿荣，到北京某药店买龙骨，得了一块有字的龟教，见字和金文相似，就问来源，并许再得了有字的龙骨他要，价每字银二两。回家研究，颇有所得。王襄生是研究甲骨文的第一人。”

至于第二种说法，即王襄、孟定生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最先发现了甲骨文之说，是上个世纪80年代后出现的。起先是《历史教学》杂志1982年第9期发表了王襄写于1955年的遗著《盩室殷契》一文，文中指出：“世人知有殷契，自公元1898年始。”“余也宅此殷契近六十年”。与此同时，王翁如先生写的《盩室殷契·殷》也在同期发表，称：自光绪二十四年

(1898) 作者购藏殷契起至乙未 (1955) 写本文时止近六十年了。他还在 1983 年 4 月 3 日的《天津日报》上发表了题为《甲骨文是天津人发现的》，更把天津人“发现”甲骨文的时间提早到光绪二十三年 (1897)。此后，天津的《天津日报》、《天津文史丛刊》、《今晚报》等报刊连篇累牍地发表文章，以王襄遗文中的一句话为依据，有的并上溯到 1935 年王襄在《题易鲁国殷契拓册》中提到“范估售古器物来余斋，座上讼言所见，乡人孟定生世叔闻之，意为古简，促其诣车访求，时则清光绪戊戌冬十日也”一句，提出甲骨发现应提早到 1898 年，且是天津孟、王二人首先发现。这一说法在 80 年代中期喧闹了一阵后并来引起共鸣。1996 年，又有人以“英夫”为名在《中国文物报》第 40、41 期上发表《甲骨文发现旧说之疑》，抓住王懿荣吃药发现甲骨一事不放，试图否定王懿荣于 1899 年最早发现甲骨文的“旧说”。

王襄等于光绪二十四年 (1898) 最早发现甲骨文的“新说”出现后，学界发表了一些文章如胡厚宣的《再论甲骨文发现问题》、王宇信的《关于殷墟甲骨文的发现》、吕伟达的《甲骨文发现“旧说”钩沉》、徐义华的《也谈甲骨文发现的“旧说”》(以上文章均作为附录收入《王懿荣集》) 和秦文生的《王懿荣最先发现甲骨考》(收入《纪念王懿荣发现甲骨文一百年

论文集》，齐鲁书社 1999 年出版）等文，维护“旧说”而驳斥了所谓“新说”。他们指出，早期收集、研究甲骨文的学者均公认王懿荣是发现、研究甲骨文的第一人。王襄作为较早收第研究甲骨的学者，在早先时候公开发表的论著中也认为甲骨文发现在 1899 年。他在 1925 年出版的《蕙室殷契徵文》序文中说：“前清光绪己亥下迄民国纪年，此十四年间所出甲骨颇有收获。”1933 年出版的《题所录贞卜文字》中，王襄又说：“前清光绪己亥（1899）年，河南安阳出土贞卜文。”1935 年出版的《蕙室题跋》中，他也是说：“范估售古器物来余斋，座上讼言所见，乡人孟定生世叔闻之，意为古简，促其诣车访求，时则戊戌（1898）冬十月也。翌年（1899）秋，携来求售，名之曰龟板，世人知有版契自此知。”后一段话的意思是，孟定生在光绪二十四年（1898）就疑心这些东西是古简，但等第二年才者见这些东西并名之曰“龟板”。但这时王懿荣已认出，王襄在《蕙室跋契》中的说法与王襄以前所持的观点是有矛盾的。既然王襄晚年的说法与早年的说法有矛盾，一跋应以当事人早年的说法为准，因一般说来当事人早年对事情发生记述要比晚年要确切些。而且把甲骨文发现时间和最光发现者确定为 1898 年和王襄等人，是仅凭王襄两篇文章中的几句话，没有其他证据，而王懿荣作为“研究甲骨的第一人”，是得到公认的。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看出，以上两说中的前一说法即有关甲骨文发现于光绪二十五（1899）和第一个发现者为王懿荣的“旧说”，是完全可信的。王懿荣被海内外学者誉为甲骨文之父是当之无愧的，或者说，发现甲骨文这一重要事件涉及了更多的人，包括王襄、孟定生也几乎与王懿荣同时搜购甲骨，是一项集体性的成就，但王懿荣是最受关注、最有代表性的人物。这与王懿荣、王襄等人在当时文化界的地位也多少有些关系，王懿荣是当时文坛的领军人物和公认的金石学权威、大古董收藏家，而王襄当时还只是天津里弄教私塾的二十几岁的秀才，因此，王懿荣的鉴识自然更具有权威性。

### （三）开辟中国学术新纪元的重大发现

甲骨文被王懿荣确认并从而地立起甲骨学，在文化学术界引起了连锁反应。它为回溯华夏文明的历史源头，为殷商考古学的发展，为古文字学、古代科技史、古文献襄理、甲骨大书法艺术等其他领域的进襄，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它不仅开辟了中国学术的新纪元，并且促进了国际学术事业的发展。

学者们高厦评价了王懿荣翻开甲骨学的第一页，在中国学术史上的重文意义。开鲁书社 1999 年出版的《纪念王懿荣发现甲骨文一百周年论文集》，收录



了王宇信的《中国的旧学自甲骨文之出而另辟一新纪元》、杨升南的《开辟中国学术新纪元的重文发现》、李绍连的《甲骨文与中华文明史》等文，就充分肯定了王懿荣发现甲骨文在中国学术史上所具有的开辟新纪元的里程碑式的重要地位。他们指出：殷墟甲骨文的发现，证实了商代历史为信史，也有利于探索殷文化前的夏文化，把我国有文献可征的历史上推了几百年，为回溯华夏文明的历史源头提供了基础。甲骨文发现以前，学术界对夏商周三代的历史尤其是夏商史是十分渺茫的，其原因在于“文献不足征”。甲骨文提供了研究商代历史的最重要的直接史料。王懿荣首先认定甲骨文是新代古文，罗振玉首先考定殷墟是商王都和审释帝王名号，为利用甲骨文研究商史奠定了基础。王国维作《殷商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续考，使《史记·殷本纪》和《帝王世纪》等书所传的殷王统得到了物证，从而使传说的商代变为信史。此后，出现了其他一些运用甲骨文研究商史的重要成果，如郭沫若的《卜辞中的古代社会》、胡厚宣的《甲骨学商史论丛》等论著。通过甲骨文认识商文化，也为探索夏文化提供了起点，还使学者们相信既然《史记·殷本纪》所记不虚，那么《史记·夏本纪》当亦有据，这样就把中国的信史提前了一千年。

1996年，国务院决定实施“夏商周新代工程”，希望确定商周和商代后期比较准确的年代、商代前期

比较准确的年代框架及夏代基本的年代框架。这一项目的重要基础就包括殷墟甲骨文的研究，其中涉及商代后期的四个专题为：殷墟文化分期与年代测定；殷墟甲骨分期与年代测定；殷墟甲骨文和金文年祀研究；甲骨天象记录和商代历法。以下是“夏商周断代工程”成果《夏商周年表》的商代部分：

商前期

1600—1300（公元前，下同）

商代后期（盘庚迁殷后）

盘庚、小辛、小乙 1300—1251（50）

武丁 1250—1192（59）

祖庚、祖甲、廪辛、庚丁 1191—1148（44）

武乙 1147—1113（35）

文丁 1112—1102（11）

帝乙 1101—1076（26）

帝辛 1075—1046（30）

所有这些商史研究的重要成果都表明，甲骨文的发现对史学研究是有重要意义的。

王懿荣发现甲骨文推动了中国近代考古学的产生和发殷。安特生 1921 年仰韶遗址的发掘是中国近代新石器时代考古学的开端，标志着中国近代考古学，从金石学的“酝酿时期”萌芽而出，进而以甲骨出土

地河南安阳小屯村殷墟的考定和用近代考古方法搜求发掘甲骨文为契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自1928年至1937年组织的15次殷墟发掘，使殷商考古学经历了“萌芽时期”、“形成时期”和“发展时期”，为中国近代考古学的产生和发展奠定了基础。因此，中国考古学是从以搜寻甲骨文为主要目的的殷墟发掘开始的，而殷墟发掘则是由王懿荣的惊人发现导引的。正是由于有甲骨文的惊人发现，才有刘鹗的《铁云藏龟》一书的商世，才有罗振玉的安阳洹上访古并确认殷墟为商王朝晚期都墟，才引起了以搜寻甲骨文为目标的殷墟考古发掘，从而拉开近代考古学发生和发展、近代考古大发现的序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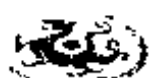
王懿荣发现甲骨文，有利于探清汉字的源流，促进了古文字学与甲骨书法艺术的发殷。我们今天使用的汉字经历了数千年的发展历史，甲骨文是汉字发展历程中的重要环节、重要阶段。在甲骨文之前，有新石器时期晚期陶片上的刻划符号，是汉字萌芽，但还只是些简单的符号和单字，无规律可循。有一定的数量并有一定的体系、规律，从目前的材料而言，是从甲骨文开始的，因此甲骨文可以说是汉字的鼻祖。甲骨文中的单字约有5000字左右，以象形字为主，并有大约20%左右的形声字，已有后来汉字的基本特点（方块字，字形结构上可用“六书”即象形、指事、会意、形声、假借与转注），但还不稳定，如象

形字中一个字有多种不同的写法。通过研究甲骨文，上可溯汉字的源头，下同西周金文、战国文字及秦篆相比，从而梳理汉字的流变。甲骨文的出现使以地下出土的文字资料为研究中心的古文字学兴起。由于有甲骨文的比较，也使金文研究拓展出一个新的境界。甲骨文已具备了中国书法的三个要素即用笔、结字、章法，是我国书法的源头。因此，甲骨文的发现还推动了甲骨书法艺术的发展。

甲骨文的发现还推动了对古文献的整理、研究。民国初年以来，以顾颉刚为代表的展古派一味“疑古”，将大量的文献典籍列为伪书，使古文献的价值受到怀疑。甲骨文发现后，既熟悉古典文献又掌握地下资料的王国维等人，在中国学术史上别开生面地开创了以甲骨文与古文献互为参证的“二重证据法”，既恢复了古史，也恢复了古文献的史料价值，推动了对古文献的整理与研究。根据甲骨金文等直接资料以印证古书的“新证”类著作，如王国维的《古史新证》、唐兰的《古籍新证》、于省吾的《群经新证》及《诸子新证》等相继问世。

甲骨文的发现在科技史等其他领域也有着重要影响，有着多方面的科学价值。中国学术因甲骨的发现而开创了新的纪元，这一里程碑性的起点是：光绪二十五年（1899）甲骨被王懿荣最早发现、鉴识、收藏和断代。





## 七 庚子殉难

### （一）临危受命任京师团练大臣

王懿荣最早发现、收藏甲骨文，但未及对甲骨文进行深入的考订、研究，就在次年的庚子国难中以身殉国了。他没有留下任何有关甲骨文的著述。他是第一位甲骨大宗收藏者，但甲骨在他手中的时间不长。光绪二十五年（1899）秋，王懿荣始见甲骨。次年即光绪二十六年七月二十一日（1900年8月15日），他已殉难，过早地与甲骨文分手了。

古人有忠孝的观念，且每感叹忠孝难以两全。光绪十二年二月十四（1886年3月19日），王懿荣的父亲病逝。十年后即光绪二十二年（1896），其母亲谢太夫人也病逝。如果说在这之前他还要考虑侍养父母、在家尽孝的问题，现在父母双亡，已了无牵挂了。他在为母亲守丧期间，曾从故里福山驰函天津，手谕次子王崇烈：“吾父母不能奉养矣，此后之致身君国者，赴汤蹈火亦不故辞。”他已萌发了赴汤蹈火

的殉国之念。

在当年的甲午中日战争中，王懿荣曾主动请缨，回籍兴办团练，但壮志未酬，他还没拉起队伍，清王朝已割地赔款、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了。他在事后写下了《偶感》一诗，来表达自己的情感：

岂有雄心辄请缨？念家山破自魂惊？  
归来整旅虾朝散，五夜犹闻匣剑鸣。

眼下国运多舛，列强肯定还要挟枪来犯，自己还应当拔剑相向，为挽救民族危亡而搏杀的。正如他所预料的，《马关条约》签订后，列强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它们强租港口，强占租借地，在短短的几年里辽阔的中国版图已被列强割占殆尽。它们还在大量倾销商品的同时，附加苛刻条件大量向中国输出资本。早于王懿荣殉难的另一位豪杰谭嗣同曾发出“四万万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的浩叹。

王懿荣居故里守丧期间，商对山河破碎，忧心忡忡。他以读礼之暇，重修福山县志，但因旧志印行已久，里纂新志事多待访，于是先定义例，后陆续从事，撰写有《选举表》2卷，《宦绩》中的《节孝》一门，还有《金石志》。一直到他殉国，仍未成书，庚子之难后仅存《福山金石志》残稿。

他仍保持“嗜古”本性，居丧期间倾心于搜求金

石古物，凡书籍字画，三代以来的铜器、印章、古钱、残石、片瓦等，无不珍藏而秘玩之。因搜求古物需费巨资，手头颇为拮据，处极困之时，则典当衣物以求文物，或为了求得新的金石珍品而不得不将原有藏品拣出一些抵押出去，前后抵押了一百多种，一直不愿将其卖掉。他还通过考证、鉴识文物，补证经史，搜先达所未闻，通前贤所未解，爬梳剔抉，每有创见。王懿荣一生钟爱收藏、考订金石古董，因此在他走到生命尽头前夕，首先发现甲骨文，虽属偶然，但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必然的。天道酬勤，首先发现甲骨是对其“性嗜金石”、“好古成魔”的一种回报。

但他又生不逢时，时值山河破碎，面临亡国灭种之际，至死仍保有书生本色、仍热衷学术的文人学者，不得不关心于书斋以外的世界，不得不为抗敌搜国投笔从戎，不得不过早地离开他所钟爱的事业。他三任文坛领军人物的祭酒，但次次均是临危受命，最后知危局难收，以身殉国。祭酒忠烈唯独一人。

光緒二十四年二月十二日（1898年3月4日）邸鈔：清會典館總裁、大學士麟書，以《會典》全書，修纂過半，而王懿榮出力甚多，奏請朝廷予以嘉獎。物廷降旨賞加二品頂戴。王懿榮具疏謝恩。喪服滿后，他即率長媳張氏及孫子王福坤由福山回到北京。四月二十一日（6月9日），奉旨仍在南書房行走。光緒二十五年五月二十九日（1899年7月6日），他

第三次出任国子监祭酒。

帝国主义侵略加深，民族危机日益严重，促使各阶层人民奋起为救亡而斗争。在资产阶级领导的戊戌维新运动和革命运动兴起的同时，农民的反洋教斗争进一步发展成为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王懿荣居丧期间，义和团运动就已在他的家乡山东兴起。当他由福山回京时，义和团运动恰好也发展到直隶、京、津一带。在义和团的打击下，在华教会纷纷向本居政府发出战争呼吁。列强一面向清政府施加压力，勒令清政府镇压义和团，一面加紧准备直接出兵进行武装干涉。光绪二十六年三月（1900），英国派兵舰三艘，美国、德国、意大利各派兵舰一艘到大沽口外示威。五月初（5月31日至6月2日），英、俄、美、意、日、德、奥等八国侵略军共451人开进北京。但驻京各国公使认为，势态越来越严重，400余人的使馆卫队不够，于是又电令各国政府增兵。五月十四日（6月10日），八国侵略军2000余人由英海军中将西摩尔率领，在塘沽登陆，向北京进发。由于洋人逼迫慈禧“还政”于光绪帝，对列强一向顺从的慈禧太后于五月二十五日（6月21日），下诏书与八国联军宣战。

在慈禧太后宣战前夕，五月二十一日（6月17日），奉朝廷上谕：著派兵部侍郎李端遇（字小研，山东安丘人）、王懿荣为京师团练大臣，办理京师团



练事宜。会同五城御史，督率兵勇，严密稽查，加强巡逻，城门出入，要按时开闭，以保京城安定。

这样，国家危难又把王懿荣的命运置于生死关头。

## （二）为国捐躯，丹心照汗青

王懿荣早已萌生殉国之念，今接上谕，深知保卫京城责任重大，而危局显然难以挽回，自己为国捐躯的时候已经到了。因此，他接上谕后总是喟然长叹：“此天与我以死所也。”既无法力挽狂澜，他只有以死家表明自己忠君爱国之心迹了。他在给妹夫张之洞的信中接到：自己受命以来，“实作看街老兵，朝廷亦未尝以兵事责之”，也就是说虽身为团练大臣但根本没有军事指挥权。中国在甲午战争中战败，“然自甲午以来，及今又六七年，中国兵事仍是不行”。如今时势岌岌可危，自己正为国势艰难而忧愤，日夜操劳，“日不得安靖”。下属 1000 余人的团民，半是老弱残兵，又几乎是赤手空拳，不可能有什么大的作为，只能是“尽其心力之所能为者而已”。为了搞到武器，自己曾四处奔走，“此一千五百人赤手白战，即有钱也无处购买”，故只能向为官湖广总督的妹夫张之洞“暂乞军械”，垂泣而请求他“能稍为捐置”。王懿荣对局势及自己所面临的处境深感悲观，天津已

亟亟可危，京城“估计为时亦必不能久”，自己身为朝廷重臣，如果城池失陷，“则重臣之不得不罪夫”。他已作了最坏打算，好在次子王崇烈已于五月十二日（6月8日）请假，携其妇子乘船由天津返回福山故里，总算少了一种心事，而自己则“鰕生一命何足道哉”，随时准备殉难的了。

当时，与王懿荣一起奉命的另一团练大臣李端遇，正因病休假，因此，重担主要落在了他的身上。他多次致信李端遇，谈到自己会同五城都督办理团练之事，包括筹款、筹粮、起草条规、开局、括集练勇等事，谈到了办理诸事之难。且虽责任重大却无多少实权，“在此权作看街老兵，并无一丝事权之可假也”。他居住在离皇宫不远的锡拉胡同11号，而团练局设在琉璃厂的安平公所。他每日到局，一日来回几次，路上还要遭义和团盘问，尤其是在义和团攻打而什库教堂、东交民巷后，东而两甬路情势更紧，必须绕德胜门才可出宣武门，到团练局就更难了，有时则无法前往，使他心急如焚。

当时清政府如何对待义和团的问题上意见不一。有的主张把义和团作为“乱民”严加镇压，不使洋人找到借口；有的主张对义和团加以利用，给洋人一些打击，同时对义和团加以控制。慈禧决意利用义和团以泄洋人逼她“归政”之私愤后，义和团在京津迅速蔓延，并不可避免地有些越轨之举。王懿荣是反

对清政府利用义和团报复洋人的，在被皇帝召见时力陈情状，要求严饬统率大员对义和团妥加控制，避免发生寻仇抢劫之事，以安定人心，并避免轻启外侮。八国联军入侵以后，又因练勇与义和团之间不相协调，时生齟齬，他又尽量约束部民，并安抚拳民。他的处境是异常困难的，并由于李端避多病，因而实际上独当其冲，每为团练之事“昼夜擘画，日无暇晷”，“往往夜漏三下，未即就眠，必力交瘁，殆难言喻”。

王懿荣在北京的寓所的庭院里有一口井，井穴又宽又深，比一般的井要大过一倍。平日为安全起见，在井口上放了一块横石，并有巨石作为井栏。六月间，北京的局势更加危殆，他与谢夫人深知京师必危，率领仆人启开横石，加大井口，将井挖深，掏净，并说这是“止水”之计。实际上他与谢夫人已作过认真的考虑，深知城破之日必死，而这口井将是他们的最后归宿。长媳张氏惨立两侧，默然无语。

其时京师粮食供应也成了大问题。他在给天津的次子王崇烈的信中写道：“京师闭塞，若非尔谢仲廉母舅之报济，已成饿殍。”信中催促王崇烈速携妻女离津。王崇烈遵从父命，携家眷返福山被里。王懿荣少一心事，得些许安慰。

八国联军不断增派援军，到向天津发起总攻时已达万余人，侵略军于六月十七日（7月13日）发起攻城，次日天津城陷落。王懿荣在给李端遇的信中提

到，他是在与人交谈时获悉天津失事的，自己是“五中焦灼，偏又患病”，八国联军侵占天津后，继续纠集人马，扩大侵略。七月初十（8月6日），杨村失守，裕禄自杀。李秉衡率领各地赴京援军万余人在通州迎战，兵败自杀。王懿荣照常人值南书房，并到团练局视事，关注着战场上的每一步进展。尽管八国联军遭到了义和团和清军的阻击抵抗，但还是节节逼进京师。七月十九日（8月13日），通州失守。

七月二十日（8月14日）晨，日俄侵略军进抵北京城下，向内城的东直门、朝阳门发动猛攻。义和团和部分清军奋勇抵抗，打死打伤300余人。同日中午，英、美侵略军抵达北京外城的广渠门、东便门。由于此处守军人多前往内城助战，英、美军乘虚攻入。14日晚，日、俄军也攻入北京。这一天，王懿荣还是像往常一样，从宣武门而出，来到团练局。那时，洋兵已攻入京城。董福祥的甘军溃散，充斥街巷。他曾率练勇在东直门抗敌，由于溃兵塞途，人心惶乱，练勇也溃不成军。王懿荣知大势已去，但还是坚持到晚上方才入城。

夜半时分，王懿荣在京寓庭院徘徊，听到洋兵攻打东直门的枪声，念及两宫被惊扰，而自己不能入内，深感惭愧。他对家人表示：“吾身渥受国恩，又膺备卫之责，今城破，义不可苟生。”

次日（8月15日）早晨，获悉慈禧太后率光绪





及王公亲贵正于早些时候往西逃跑。上午十时，他对谢夫人讲：“吾可以死矣！”并用楷书在纸上写下了绝命词：

主忧臣辱，  
主辱臣死。  
于止知其所止，  
此为近之。

此绝命书存故宫博物院。绝命书字写得精湛、刚健，体现出他临终前从容不迫、视死如归的气概。绝命书末署“京师团练大臣国子监祭酒南书房翰林王懿荣”。

绝命书写毕后，他先吞金与铜钱，两次自杀未果，接着饮药服毒，仍未绝，于是投入庭院的那口井中，终于壮烈殉国。时年 56 岁。

谢夫人率长媳张氏相从人并而死，真可说是“忠贞孝义，萃于一门”。仆役知王氏夫妇早有殉国之念，不可能加以阻拦，遂强拉王崇焕等出避，免于一死。谢夫人生于咸丰八年（1858），享年 43 岁；长媳张氏生于同治八年（1869），享年 32 岁。

十天后，侍郎张英麟（字振卿，山东历城人，同治四年乙丑科进士，官至督察院左都御史）筹措了 70 余金，置办了三口薄棺送到王懿荣的府邸。由国

子监学正王伯恭率领南学诸生，将王氏夫妇等人的尸体从井中捞出，暂时收敛，浅葬于室内离井不远的花园隙地，后三灵柩又被移葬于京师郊外宝应寺之义园。

九月初八（10月30日），行在内阁抄奉上谕，表彰他“敦品绩学，持躬清正”，“平日夙怀忠义，恩济时艰”，尤其是在危难时刻，为国尽忠，“临难捐躯，从容就义”，忠烈可风，大节凜然，宜大加褒扬，并追赠侍郎銜。九月二十四日（11月15日），赠子“文敏”谥号，是为王文敏公。

光绪二十七年二月（1901年3月），次子王崇烈扶三灵柩，经天津由海路运返福山，安葬于两甲坡西北顶王氏家族新塋。

光绪二十九年（1903），王崇烈在北京锡拉胡同11号京寓建家祠奉祀王懿荣。张之洞题写了“福山王大敏公家祠”的祠额。王懿荣殉节的井旁则立一精致砖亭，勒石纪之曰“福山王文敏公殉节处”。由国子监奏准，将王懿荣及当时殉节的另一祭酒附祀于国子监韩文公祠。

时人高度评价了王懿荣临安受命、杀身成仁的忠烈气节。这种可歌可泣的民族气节也将永远值得铭记、景仰和纪念。



## 八 甲骨显学

### (一) 第一部甲骨著录书与 第一部甲骨考释专著

王懿荣发现甲骨文，但过早地与之分手了。他用重金搜求甲骨并“细为考证”，不过未及留下有关文字。他的惊人发现却启导着一门被称为“甲骨学”的新学问的形成和发展。一百多年来，一代代学者薪火相传，致力于搜集、挖掘、破译和研究甲骨文，搜甲骨学成了一门显学。

王懿荣殉国后，他所收藏的甲骨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多被刘鹗购走。刘鹗，字铁云，又字蝶云，号鸿都百炼生，江苏丹徒人，生于道光三十年（1850），卒于宣统二年（1910），是清末四大谴责小说之一的《老残游记》一书的作者。刘鹗除购得王懿荣所藏甲骨外，还通过其他途径收集，总计收集到甲骨 5000 片以上。光绪二十九年，他从搜集到的甲骨中选出了 1058 片，编为《铁云藏龟》一书，以石印

出版。1058片中伪刻4片，重出3片，实为1051片。在该书的自序中，他试释了40余字，34个是正确的，其中包括19个干支和2个数字。该书是公开印行的第一部甲骨文著录书。此后，更多的甲骨著录书面世。到上世纪80年代末，国内外出版的各种甲骨著录书籍达80余种。

《铁云藏龟》的问世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使甲骨文由古董收藏转为科学研究的对象。最早对甲骨文进行专门研究的学者是清未经学大师孙诒让。孙诒让，字仲容，晚年又号越东逸民，浙江瑞安人，生于道光二十八年（1848），卒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是著名的经学家和古文字学家，著有《周礼正义》、《墨子间诂》、《古籀拾遗》、《古籀余论》等。光绪三十年（1904）他用两个月的时间对《铁云藏龟》所著录的甲骨文资料作了考释，写出了《契文举例初稿》，后做过修改，但迟至1917年才出版。此书成书早，是对甲骨学的创立具有开山作用的第一部甲骨文考释专著。

《契文举例》分上下两卷十篇，约5万字，按甲骨大内容进行分类考释。书中首先引用古籍以说明甲骨文中的内容，再用字形比较和偏旁分析法作考释，正晚地识读了100余字。但由于处在初创时期，所依据的资料有限，著者也未见过实物，释错的字也很多。



《铁云藏龟》与《契文举例》，对甲骨文作了最初的著录和考释，有筌路褊褊之功，是甲骨学拓荒阶段的标志性著作。

## （二）“甲骨四堂”

著名学者陈子展在评价早期的甲骨学的时候写下“堂堂堂堂，郭董罗王”的名句。“甲骨四堂”即郭沫若（鼎堂）、董作宾（彦堂）、罗振玉（雪堂）和王国维（观堂）。唐兰在《天壤阁甲骨文存》自序中则称“自雪堂导夫先路，观堂继以考史，彦堂区其时代，鼎堂发其辞例，固已极一时之盛”。在此四人中，罗振玉最早接继甲骨文且成就突出。罗振玉，字叔蕴，号雪堂，浙江上虞人，生于同治五年（1866），卒于1940年5月14日。光绪二十八年（1902），他第一次在刘铁云家看到甲骨文的墨拓本，在他的建议、帮助下，《铁云藏龟》于次年出版。他对甲骨学的贡献主要是：（1）考定小屯为故殷墟。甲骨最初被发现和收藏时，古董商为了垄断生意故意隐瞒出土地，或说汤阴，或说卫辉。罗振玉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奉调学部后，开始收藏甲骨，并调查甲骨的真正出土地。光第三十四年（1908），访得甲骨出土地为洹水之滨的小屯村。次年获日本林泰辅寄赠的《清国河南省汤阴县发现之龟甲兽骨一》一文，罗氏觉得有展，以三

月之力写成《殷商贞卜文字考》，考证了出土甲骨的安阳小屯就是文献所载的“殷墟”。(2) 审释殷帝王名号。他将甲骨文中的人名与《史记·殷本纪》中商王名加以比较，发现其大部分相同，提出殷自成汤至帝辛 30 世，其名谥见于卜辞者有 17 次。(3) 著录和考释甲骨文字。在著录方面，有于宣统三年（1911）编成的《殷商贞卜文字考》，共收拓片 2221 片；于 1914 年出版的《殷墟书契精华》；分别于 1911 年、1916 年和 1933 年出版的《殷商书契前编》、《殷商书契后编》和《殷商书契续编》。考释方面有：1914 年出版的《殷墟书契考释》，1927 年出版的《增订殷墟书契考释》等。所释文字 571 字，并提出了“由许书以上溯古金文，由古金文以上窥卜辞”的方法。

王国维的治学方法与学术观点与罗振玉相似，学界将他们把甲骨、金文和其他新资料与古籍相结合，创立古史和古文献研究的新方法，称为“罗王之学”。王国维，初名国桢，字静安，又字伯隅，初号礼堂，晚号观堂，又号永观，浙江海宁人，生于光緒三年（1877），卒于 1927 年，是我国近代最著名的学者之一。在甲骨文著录和考释方面，于 1917 年出版《戡寿堂所藏殷墟文字》，著录 650 片拓片，且有考释，是一部有释文的甲骨著录书，他的出版为甲骨文的研究提供了更多的重要资料。与此同时，他发表了《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和《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

续考》，两文将甲骨文中出现的商王先祖名号与受祭次序同《史记》中所记载的商代先公先王的庙号、世系进行对照，发现《史记·殷本纪》中的记载除个别地方有误外基本上是可信的，还根据甲骨材料对《史记·殷本纪》中记载的错误一一加以订正。1925年，他经胡适介绍进入清华大学国学研究所，提出考证古史必须利用遗留下来的古籍和地下发掘之材料相互印证的“二重证据法”，并写出了《古史新证》和《殷礼徵文》等论著，将甲骨文研究由孙诒让以来的单纯文字考释推进到利用甲骨文研究古代历史的新阶段。

从王懿荣发现甲骨文至1927年的近30年时间，被称为甲骨文研究的初期阶段。这一阶段的研究者及著述除上述提及的刘鹗、孙诒让、罗振玉、王国维外，还有王殷的《盩室殷契类编》、《盩室殷契征文》，商承祚的《殷商文字类编》、《殷墟文字考释》、《殷墟文字》，叶玉森的《殷契钩沉》、《说契》、《研契枝谭》、《铁云藏龟拾遗》，容庚的《甲骨文之发现及其考释》等。

甲骨学从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开始进入了一个重要发展时期，其主要标志是：以郭沫若为代表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进行研究，使甲骨文跳出“国学”的圈子；董作宾等主持了大规模殷墟发掘，在甲骨资料方面根供了空前的来清，为甲骨断代等问题的研究提供了有利条件。郭沫若、董作宾成为“面堂”

中的另外二人。

郭沫若，学名开贞，号尚武，1925年开始号鼎堂，四川乐山人，出生于光绪十八年（1892），卒于1978年。1928年，他在日本查阅了罗振玉编的《殷墟书契》，并得到了王国维的《殷墟书契考释》，开始了甲骨文研究。他几乎访遍了日本所有的收藏者，掌握了大量的实物资料，1929年编撰了《甲骨文字研究》。此前，他出版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中就已收录了其《卜辞中之古代社会》一文。1933年出版了《卜辞通纂》，著录甲骨929片。1937年出版《殷契粹编》，从收藏家刘体智的28000多片甲骨中精选1595片编成。晚年担任大型甲骨文汇编《甲骨文合集》的主编。在利用甲骨文研究商史方面，他是我国第一个以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来指导古文字和古代社会研究的学者。

董作宾，原名作仁，后改作宾，字彦堂，又字雁堂，别署平庐，河南南阳人，生于光緒二十一年（1895），卒于1963年，是我国近代甲骨学、考古学的奠基者之一。1928年10月，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成立，董作宾被聘为通信员，受命到安阳进行殷墟调查。回京后他汇报了在安阳的考察情况，认为甲骨尚未挖掘完，呼吁不要使国宝受到损失，也不能再让国宝流散国外，正式发掘刻不容缓。报告得到蔡元培院长的重视。几天后，他再次来到安阳，中国文



物考古史上首次对殷墟发掘拉开序幕。从 1928 年 10 月至 1937 年 6 月，“史语所”共对殷墟进行了 15 次发掘，董作宾是第一、五、九等三次发掘的主持人，第二、三、四、六、七等次发掘的参加者，并监督了第 11、13 次发掘。总计 15 次殷墟发掘，共发现字甲骨 30000 片。董作宾将发掘所得的甲骨文辑为《殷墟文字甲编》和《殷墟文字乙编》，两次著录甲骨 13000 余片。他对甲骨学的最大贡献是创立了甲骨断代学，他 1933 年出版的《甲骨文断代研究》被公认为中国甲骨文史上划时代的名著，该书掘出了掘据世系、称谓、贞人、坑位、方国、人物、事类、文法、字形、书体等项标准把甲骨文分为五期的理论，把甲骨学研究推向了全断的阶段。他还以甲骨文材料为基础对殷历法进行研究，于 1945 年出版了《殷历谱》。

从殷墟发掘到解放前后的 30 年是甲骨学的重要发展期。这一阶段从事甲骨学研究的学者已近 300 人，出版的甲骨大著作增加到 170 多种，著录和公布的甲骨文资料 4 万多片，共发表有关甲骨文与商代历史文化方面的研究论文与专著 800 多种。除前述郭沫若、董作宾等人的著作外，还有如胡厚宣的《甲骨学商史论丛》，商承祚的《殷墟文字类编》、《福氏收藏甲骨文字》、《殷契佚存》，于省吾《双剑谿契骈枝》初编、续编、三编，唐兰的《天墟阁甲骨文存》、《殷墟字记》，孙海波的《甲骨文编》、《甲骨文录》，朱芳

圃的《甲骨学文字编》、《甲骨文商史编》等。

### （三）新中国成立以来甲骨文的发现与研究

新中国成立以后，甲骨学的发展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在甲骨文的发掘、征集和著录方面，殷墟发掘工作规模展开，在甲骨文方面有许多新发现。建国以后殷墟出土甲骨数量最多的一次，是1957年考古研究所在小屯南地所发现的一批甲骨，这批甲骨共7150片，其中有字甲骨4829片。原先由私人收藏的甲骨文部分收归到图书馆、博物馆、高等院校和研究单位，例如早期刘鹗、罗振玉和哈同夫人所收藏的甲骨文，几经辗转最后收归新江博物馆、山东博物馆等单位。刘体智收藏的28000多余片甲骨文藏品掘给了文化部，后转归北京面书馆。王展也将自己收集到的甲骨藏品献给了天津文化局，后归天津博物馆收藏。一批甲骨文著录书得以及时出版。胡厚宣于1951年出版了《战后宁沪新获甲骨集》、《战后南北所见甲骨录》（上、下），于1954年出版了《战后京津新获甲骨集》，于1955年出版了《甲骨编存》，以上四种连同1945年出版的《甲骨六录》，共著录甲骨13814片。其他著及书还有李亚农的《展契摭佚续编》、郭

若愚的《殷契拾掇》（一、二编）、陈邦怀的《甲骨文零拾》、董作宾等的《殷墟文字外编》、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刊布的《小屯南地甲骨》（上、下册）等。迄今为止工程最大、成绩最为卓著的著录书是由郭沫若主编、胡厚宣任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先秦史研究室编著的《甲骨文合集》，该书自 1978 年出版，至 1983 年共出 13 册，收录甲骨 41956 片。

在甲骨文考释方面，新中国成立后出版了一些甲骨文字考释的专著，有的是增订改编后再版，如杨树达于 1954 年出版的《程微居甲之说》，朱芳圃于 1966 年出版的《殷周文字释丛》，孙海波于 1965 年增订改编的《甲骨文编》，金祥恒于 1959 年出版的《编甲骨文编》等。此外，张政烺发表过《释甲骨大中俄、隶、蕴三字》、《卜辞袁田及相关诸问题》等考释论文，裘锡圭发表了《说甲骨文中的“五刑”》等波十篇考释文章，王宇信、范毓周等也发表过考释论著。经过几代学者的努力，迄今已发现的 5000 余个殷墟甲骨大中，已有 1000 多个被识出，且获公认。

在利用甲骨文商史研究方面，重要论著有胡厚宣于 1950 年出版的《古代研究的史料问题》，郭沫若于 1952 年出版的《奴隶制时代》，李亚表于 1953 年出版的《殷周时代社会生活》，周谷波于 1956 年出版的《古史零证》，丁山于 1956 年出版的《甲骨文所见氏族及其制度》，刘节于 1958 年出版的《古史考存》，

吕振羽于 1962 年出版的《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金景芳于 1962 年出版的《中国奴隶社会的几个问题》，杨宽于 1965 年出版的《古史新探》等。

在甲骨文的缀合方面，也出版了一些论著。1950 年，曾毅公编印《甲骨缀合》，收录 396 片；1975 年，郭若愚、曾毅公、李学勤共缀合甲骨 482 片，印为《殷墟文字缀合》；1975 年，严一萍编印了《甲骨缀合新编》，收录 700 多片。

在甲骨断代学方面，陈梦家从 1949 年开始研究并写作了《甲骨断代学》四篇，对董作宾提出的“五期”分法和“十项”标准作了补充和修订，提出了分期新代的“三个标准”和“九期”分法。李学勤于 1958 年发表了《帝王时代的非王卜辞》一文，提出这一部分甲骨是非王卜辞，对这类卜辞的时代问题提出了新的断代意见。1977 年，他在讨论殷墟 5 号墓（妇女墓）的年代时，提出了“历组卜辞”的概念，主张从分期分组入手，提出“历组卜辞”时代应上移到“武丁晚年到祖庚时期”的看法。1991 年，黄天树的《殷墟卜辞的分类与断代》由天津出版社出版。1994 年，彭裕商的《殷墟甲骨新代》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此外，还出现了一批对甲骨文研究进行总结的综述著作。新中国成立之初，罗莘田发表了《五十年甲骨文发现的总结》和《五十年甲骨学论著目》两书，

对建国前甲骨文发现和研究进行了系统回顾和全面总结。1956年，陈梦家出版《殷墟卜辞综述》，该书共约75万字，对甲骨文发现以来60多年的研究成果作了全面总结，是甲骨学研究百科全书式的著作。1978年，严一萍在台湾编印了《甲骨学》一书，是一部系统总结80年来甲骨文发现与研究成果的综述之作。1979年，王宇信编写了《建国以来甲骨文研究》一书，对30年来甲骨文研究在各个领域中取得的成就作了介绍。

可见，建国以后由于新、老两代学者的共同努力，甲骨学在各个分文领域都取得了可喜的成果。

#### （四）甲骨文流散到国外及著录情况

在中外学者开始搜集甲骨文之后不久，一些在华的外国传教士也进行了搜集，后又将一些甲骨文资料转卖到欧美和日本，因此有为数不少的甲骨文至今流散国外。据胡厚宣先生统计，至1984年收藏有甲骨文的国家共有12个，收藏数字大致为：

日本：12443片	法国：64片
加拿大：3355片	新加坡：28片
美国：1882片	比利时：7片
德国：715片	韩国：6片
前苏联：199片	英国：3089片

瑞典：100 片      瑞士：99 片

外国学者著录、研究甲骨文的重要著作有：

(1) 日本。日本学者最早收藏、研究甲骨文的最林泰辅，他于宣统元年（1909）发表《清国河南汤阴发现之龟兽骨》；1921 年又著《龟甲兽骨文字》，收骨 1023 片。此后日本又出版了多部甲骨文著录书，如贝塚茂树、伊藤道治所编纂的《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所藏甲骨文字》，1959 年出版，收入 3246 片；松丸道雄编纂的《东京文学东洋文化研究所藏甲骨文字》，1983 年出版，收入 1315 片；岛邦男撰《殷墟卜辞综类》，1963 年出版；等。

(2) 加拿大。加拿大收藏的甲骨仅次于日本，这与加拿大传教士明义士的努力搜寻有很文关系。明义士是外国人中搜集到甲骨数最最多的，到 1917 年时购买的甲骨达 5 万片左右。他从中选出 2369 片编成《殷墟卜辞》一书，在上海出版。后来，他又于 1923 - 1926 年先后从小屯农民处买到几批甲骨，并从中选拓了 1000 多片编成《殷墟文字后编》一稿，后于 1972 年在台湾出殷。明义士收藏的甲骨多数留在中国国内，其余存于加拿大多伦多皇家安文略博物馆，在加部分由许进雄编著成《明义士收藏甲骨文字》，于 1972 年出殷，收录 3176 片。安大略博物馆还收藏有怀版光在开封购藏的甲骨，由许进雄编辑成《怀特氏等收藏甲骨大集》，于 1979 年出版。



(3) 美国。从光绪二十九年(1903)开始,山东潍县牧师美国人方法斂和英国浸礼会驻山东青岛传牧士库寿龄共同牧集一批甲骨,后方法斂将他们两人收集的甲骨编成《库方两氏所藏甲骨卜辞》,于1935年由商务印书馆石印摹本,收甲骨1687片。方法斂还编有《甲骨卜辞七集》,1938年美国纽约影印摹本出版,收甲骨527片。出版的美国所藏甲骨著录还有严一萍的《美国纳尔森美术馆甲骨文卜辞考释》(台北艺文印书馆1973年版),饶宗颐的《欧美亚所见甲骨录存》(《南洋文学学报》1970年第4期),李琰的《北美所见甲骨选粹考释》(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1970年3卷2期)等。

(4) 英国。英国传教士库寿龄早在光绪二十六年(1900)即王懿荣发现甲骨的第二年已开始购买甲骨,成为最早收藏甲骨的外国人,他收藏的甲骨后编入《库方两氏所藏甲骨卜辞》。光绪二十七年(1908),英国驻华外交官金璋也曾从方法斂手中购得甲骨,其藏品后绪为《金璋所藏甲骨卜辞》,1939年美国纽约影印出版,收甲骨484片。其他英国所藏甲骨著录书有饶宗颐辑《英国所藏甲骨集》等。

流教在其他国家或地区的甲骨文著录书有饶宗颐的《巴黎所见甲骨录》,雷焕章的《法国所藏甲骨录》,饶宗颐的《海外甲骨录遗》,胡厚宣的《苏联国立爱米塔什博物馆所藏甲骨文字》等。

当年，王懿荣最早发现却没有来得及进行深入研究，就为国殉难，过早地与甲骨文分手，给后人留下了遗憾。但由于他的惊人发现所导引的甲骨学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在中外一代代学者的共同努力下，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如果王懿荣地下有灵，他是会宽慰的。



[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

书名 = 王懿荣与甲骨文

作者 =

页数 = 1 1 3

S S 号 = 0

出版日期 =

V s s 号 = 9 3 0 2 0 1 7 6